

#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

——以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sup>\*</sup>

尤根·罗扬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摘录笔记的出版和研究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后，着重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手稿》及摘录笔记的文献学信息作了详细的描述，从而在此基础上对《手稿》及摘录笔记的诞生次序做了极为严格的、文献学的考证研究，还原了其诞生过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手稿”很可能是《穆勒摘要》的结尾；《手稿》可能并不是马克思在其“序言”中提到的那部著作；不能把《手稿》同摘录笔记割裂开来。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录笔记；考证研究

**作者** 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前秘书长，国际知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专家、MEGA<sup>2</sup>编者。

**译者** 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sup>\*</sup> 本文原载《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83年第28卷，第2—49页，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本文翻译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3XNJ025）的资助。

这篇文章被提交给了1983年1月6—9日在林茨举行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工人运动历史学家国际大会特别会议。另外，应主办方的请求，它还被提交给了1983年3月17—20日在巴黎举行的主题为“马克思的著作——百年之后”的学术讨论会。

## —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历史所作贡献的著述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几乎很难一览无遗；而关于历史学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主要对研究马克思的见解所作的贡献，却几乎从未被探讨过，这看起来并不太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它本身同样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学试图通过研究其诞生过程来说明马克思见解的意义；它在这方面不仅依据，而且首先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或者是他发表的，或者是他遗留下来的；只要有可能，历史学就以原始文本，也就是马克思本人所写的文稿为出发点，以便强调原始文本的这种确凿的、材料的方面：所有这些几乎毋庸置疑。同样的情况也很好地区适用于在利用文本时所优先遵循的那些规则。历史学在马克思之前、独立于马克思形成了相关的工作方法；他普遍地使用这些方法。《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众所周知，它在最近五十年的讨论中扮演了绝非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一案例表明，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在马克思逝世百年之后仍然特别地指出这些方法并不是多余的。

在对大量文献进行简要回顾之后，本文将只是略微谈及异化、黑格尔、辩证法等内容。与此相反，大量关于纸面（Blatt）、页码编号、分栏等的说明似乎得到了补做。按照上述的规则，这其实应在所有的讨论之前进行，即从资料考证的方面来分析著名的《手稿》。这一分析当然不会得出所有就《手稿》的内容已然写成的东西都毫无价值这样的结论，但是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为时局所惊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否已提前振翅起飞？无论如何，它开启了对马克思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令人着迷的准确认识。

## 二

就我们所知，这里所说的《手稿》的发现归功于达·波·梁赞诺夫（Д. Б. Рязанов）。他在 1927 年首次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题用俄文出版了其中一份

《手稿》(后来所谓的“第三”手稿)的大部分内容。<sup>①</sup> 1932年,《手稿》首次以原始语言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I部分第3卷中,该卷不再是由梁赞诺夫,而是由弗·维·阿多拉茨基(B. В. Адоратский)编辑出版。在编者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名概括并加以编号(I-IV)的四份文本中,三份以《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刊登在该卷第一部分中,第四份刊登在附录中,它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sup>②</sup> 此外,该卷的第二部分还收录了马克思对勒·勒瓦瑟尔(R. Levasseur)、弗·恩格斯、让·巴·萨伊(J. B. Say)、弗·斯卡尔培克(F. Skarbek)、亚当·斯密(A. Smith)、大·李嘉图(D. Ricardo)、詹·穆勒(J. Mill)、安·路·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A. L. C. Destutt de Tracy)、皮·德·布阿吉尔贝尔(P. de Boisguillebert)等人著作的若干摘录,这可能是1843—1845年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所作的。<sup>③</sup> 同样在1932年,齐·朗兹胡特(S. Landshut)和雅·彼·迈尔(J. P. Mayer)出版了一部马克思早期著作集。迈尔在此前一年就登广告宣布<sup>④</sup>,这个版本将收录那部“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马克思著作”,即——按照这里保留的MEGA中的称谓——以Ⅲ、Ⅱ、Ⅳ顺序编排的手稿Ⅱ-Ⅳ。<sup>⑤</sup>

关于这一发现所导致的结论,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尽管按照阿多拉茨基的说法,《手稿》“部分地讲是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货币等等的片断性文章”,马克思在其中“仍然多次披着费尔巴哈式哲学术语的外衣”对“资本主义真正的经济结构”作了初步的分析,<sup>⑥</sup> 但是朗兹胡特-迈尔却感到,“这部实质上已经比《资本论》抢先一

---

① 马克思:《〈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для Святого семейства”),《马克思恩格斯文库》(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第3卷,达·梁赞诺夫主编,1927年,第247—286页。1929年,该文本的法文版出版。1930年,俄文新版出版。参见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笔记》(“Notes sur le communisme et la propriété privée”),《马克思主义杂志》(La Revue Marxiste),1929年,第6—28页;马克思:《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笔记》(“Notes sur les besoins, la production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马克思主义杂志》(La Revue Marxiste),1929年,第513—538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Сочинения)第3卷,梁赞诺夫主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613—6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柏林:1932年,第29—172、592—596页。

③ 同上书,第417—583页。

④ 雅·彼·迈尔:《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Über eine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 von Karl Marx”),《红色评论》(Rote Revue),第10卷(1930—1931年),第154—157页。

⑤ 标题为《国民经济学和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和市民生活的关系(1844年)》。参见齐·朗兹胡特与雅·彼·迈尔主编,F. 萨洛蒙(F. Salomon)协助:《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第1卷),莱比锡:1932年,第283—375页。

⑥ 弗·阿多拉茨基:《导言》,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柏林:1932年,第Ⅲ—ⅩⅢ页。

步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著作”<sup>①</sup> 加强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在 40 年代实现了从哲学的“束缚”转向对历史领域的纯粹经济学考察这一传统观点建立在一种误解的基础上；因为毋宁说，这部著作揭示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基本的哲学内涵”；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最核心的著作”，因为它构成了“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的中心，在这里，他的经济学分析原则直接源于‘人的真正现实性’这一观念”<sup>②</sup>。朗兹胡特-迈尔最后说，重要的不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学术语中辨识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萌芽，而是毋宁说，把晚期著作中的经济学理论追溯到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概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同样可以很好地表述为：“至今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真正的目标”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消除‘剥削’”，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如果它并不同时是人的实现的话”<sup>③</sup>。

两位在当年就对这些被发表的文本表达了立场的作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亨·德曼（H. de Man）在他特别命名为《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谈道，这部“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著作”包含着作为马克思后来著作之基础的那些判断，这些判断揭示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动机、意义<sup>④</sup>。同时，通过比较这部著作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晚些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亨·德曼主张，不是只有一个“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有两个“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他注意到马克思的创造力在其后期著作中明显地衰退了。<sup>⑤</sup> 赫·马尔库塞（H. Marcuse）同样断言，《手稿》表明马克思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但是他的重点在于，“作为基础的哲学已经在自身中承载了革命的实践”。<sup>⑥</sup>

如果说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哲学的”马克思，那么几乎

① 朗兹胡特与迈尔：《序言》（“Vorwort”），《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1卷），莱比锡：1932年，第V页。

② 朗兹胡特与迈尔：《导言》（“Einleitung”），同上书，第XIII页。虽然在该篇导言下面署有两位编者的名字，但它实际上是由朗兹胡特写的。他在同年以专门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这篇导言。参见朗兹胡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932年卢卑克版。

③ 同上书，第XXXIII，XXXVIII页。

④ 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Der neu entdeckte Marx”），《斗争》（Der Kampf），第25卷（1932年），第224-229、267-277页。

⑤ 同上书，第224、275-276页。

⑥ 赫·马尔库塞：《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的新材料》（“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社会》（Die Gesellschaft），第9卷（1932年），第2册，第137页。

在同时发生的黑格尔耶拿手稿的出版则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学的”黑格尔。<sup>①</sup>从这两方面看,重新确定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当奥·科尔纽(A. Cornu)在他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手稿》补充到传统图景中的时候,<sup>②</sup>《手稿》却激发亚·科耶夫(A. Kojève)得出了对黑格尔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式阐释,这种阐释他自1933年起便开始讲授。<sup>③</sup>当时正在莫斯科流亡的格·卢卡奇(G. Lukács)写下了他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在他的阐述中,青年黑格尔比青年马克思先行一步;<sup>④</sup>马尔库塞在美国流亡时期写下了他关于现代社会理论起源的著作,在其中,他突出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内容,而马克思正是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sup>⑤</sup>卡·洛维特(K. Löwith)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下了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论述,在其中,他把他所视为的黑格尔最重要的追随者——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相提并论。<sup>⑥</sup>一条直线可以从科耶夫直接引向莫·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手稿》使后者确信,马克思的思想是存在主义的。<sup>⑦</sup>

正是由于与黑格尔的紧密联系,直至当时还几乎不为学院哲学所关注的马克思在战后一跃跻身一流哲学家的行列,连马·海德格尔(M. Heidegger)此时也向他表达了敬意。<sup>⑧</sup>不管怎样,现下在西方流行的马克思学起初主要对“哲学的”马克思感兴趣,因此他们自然会关注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的那些文本,进而轻易地得出这样的观点:

---

① 乔·威·弗·黑格尔:《耶拿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Jenenser Logik, Metaphysik und Naturphilosophie), G. 拉松(G. Lasson)主编,1923年莱比锡版;乔·威·弗·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Jenenser Realphilosophie), J. 霍夫迈斯特(J. Hoffmeister)主编,2卷,莱比锡:1931年。

② 奥·科尔纽:《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Karl Marx, L'homme et l'oeuvre. De l'hégélianisme a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巴黎:1934年。

③ 亚·科耶夫:《黑格尔导读:1933—1939年在高等教育学校讲授的〈精神现象学〉教程》(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Leçons sur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professées de 1933 à 1939 à l'Ecole des Hautes-Etudes), R. 格诺(R. Queneau)主编,巴黎:1947年。

④ 格·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en von Dialektik und Ökonomie), 苏黎世—维也纳:1948年。

⑤ 赫·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纽约:1942年。

⑥ 卡·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断裂——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Marx und Kierkegaard), 苏黎世:1941年。

⑦ 莫·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 巴黎:1948年,尤其是第221—241页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部分。

⑧ 参见1946年秋致让·波弗勒(J. Beaufret)的题为“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在把“异化”回溯到“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时写道:“无家可归成为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命运……因为马克思通过体验异化而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维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优越于其他历史学的。”马·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 伯尔尼:1947年,第87页。

《手稿》是马克思的著作。这里只列举几个引人注目的见解：埃·蒂尔（E. Thier）——他在1950年出版了《手稿》的新版——把《手稿》看作是“第一个系统的草稿”，更确切地说是“哲学—社会人类学的草稿”<sup>①</sup>；海·波比茨（H. Popitz）把《手稿》视为“把关于人的‘异化’的阐述扩展到整个体系”的尝试；<sup>②</sup> 雅·霍姆斯（J. Hommes）则把《手稿》看作基本本体论的大纲。<sup>③</sup> 在“以存在主义为前提把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sup>④</sup> 的流行倾向那里，“哲学的”马克思轻易地变成了“神学的”马克思；因为蒂尔无可争辩地断言：“凡涉及人的地方同时涉及上帝”<sup>⑤</sup>。于是，从《手稿》出发，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在皮·比果（P. Bigo）那里被解释成伦理学体系，<sup>⑥</sup> 在让-伊·卡尔维兹（J. Y. Calvez）那里被解释成揭示基督教“有悖于事实”的、无所不包的异化理论。<sup>⑦</sup>

这种认识兴趣是如此强烈、多样，对这一兴趣的强调亦如此清晰地存在于一些事例中。这一兴趣的方向是变化不定的，而不变的倾向是用《手稿》中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恩格斯到斯大林等追随者的马克思主义，有时甚至要求诸于晚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尽管蒂尔鉴于“当代的危害”而在他1950年的导言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关涉到我们每个人”，以便之后阐明，《手稿》提供了“何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切概念”<sup>⑧</sup>，但是在1957年的新版导言中，蒂尔认为，青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发现”，考虑到“东方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这一发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sup>⑨</sup> 但是，《手稿》不仅激发了对东欧政权的批判，而且同样激发了对西方社会的

① 埃·蒂尔：《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以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据》（“Die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nach den Pariser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国民经济学与哲学》（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卡·马克思著，埃·蒂尔主编），科隆—柏林：1950年，第4、9页。

② 海·波比茨：《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批判与历史哲学》（Der entfremdete Mensch. 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巴塞尔：1953年，第113页。

③ 雅·霍姆斯：《技术的爱欲：唯物史观的本质》（Der technische Eros. Das Wes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弗莱堡：1955年。

④ 拉·罗·朗斯莱特：《西方争论中的青年马克思与异化》（“Young Marx and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bate”），《探究》（Inquiry），第6卷（1963年），第11页。

⑤ 埃·蒂尔：《阐释马克思的几个阶段》（“Etappen der Marxinterpretation”），《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studien）（第1卷），蒂宾根：1954年，第11页。

⑥ 皮·比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导论》（Marxisme et Humanisme.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巴黎：1954年。

⑦ 让-伊·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巴黎：1956年。

⑧ 埃·蒂尔：《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第1、5页。

⑨ 埃·蒂尔：《青年马克思的人的形象》（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哥廷根：1957年，第3-4页。



批判。同马尔库塞的思想一样,当时出现的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著作之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日益引起埃·弗洛姆(E. Fromm)——他于1961年在美国出版了“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著作”的第一个版本<sup>①</sup>——等人的共鸣。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在晚年马克思中读出青年马克思的那些尝试。正如把这视为“进一步制造神话”的丹·贝尔(D. Bell)在1959年谈到的,“作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者的政治努力,它可能具有某种论辩的价值。作为朝圣者走出马克思主义丛林之进程的一个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努力,它是错误的。”因为,“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黑格尔之谜的答案之后,他立刻把哲学忘得干干净净”<sup>②</sup>。

尽管前不久(新)出版的《大纲》(*Grundrisse*)<sup>③</sup>使这一切看起来疑问重重,但是由此已经可以得出,马克思学从现在起日益专注于对《手稿》作更多相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不过这种考察对这些文本的分析本身并未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例如,虽然戴·麦克莱伦(D. McLellan)中肯地指出,这些文本记录了“马克思思想演进极其迅速”的一个阶段,<sup>④</sup>但在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他却并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sup>⑤</sup>

从《手稿》总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其资料考证方面的明显漠视,尽管它那成问题的形式已为人们所彻底地意识到。且不说大多数作者——他们为《手稿》所鼓舞而在哲学领域翱翔——几乎不倾向于俯身关注平淡乏味的相关细节,前两个版本也没有激发人们去这样做。MEGA包含着相对详细的描述,但是它对自己只是以20年代制作的复制件为依据这一点绝口不提。也就是说,它佯装出一种它根本

---

① 埃·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附T. B. 博托默尔翻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Marx's Concept of Man, with a translation from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by T. B. Bottomore),纽约:1961年,第v页。

② 丹·贝尔:《异化的“再发现”:在追寻历史的马克思过程中所作的一些笔记》(“The ‘Rediscovery’ of Alienation. Some Notes along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arx”),《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56卷(1959年),第935-936、944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莫斯科:1939—1941年,柏林:1953年。

④ 戴·麦克莱伦:《导论》(“Introduction”),《马克思的巴黎著作:一种分析》(Marx's Paris Writings: an Analysis, 约·马奎尔(J. Maguire)著),都柏林—伦敦:1972年,第Ⅺ页。

⑤ 参见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伦敦:1973年,第105-106页;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Marx before Marxism),伦敦:1970年,第162-163页:“在1844年夏,马克思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实际上是1867年《资本论》之前的几份草稿中的第一份。……在开始写作他的第一手稿之前,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15部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著作)。”

不具备的精确性。<sup>①</sup> 那些说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并不充分。在阿多拉茨基的导言中，大量的编辑问题甚至不曾提及。朗兹胡特—迈尔——他们能够以原始文本为依据——特别指出了辨识手稿所花费的辛苦。<sup>②</sup> 早在 1931 年登广告宣布“未出版的著作”的简短消息中，迈尔就只谈论了它的“资料意义”，而没有谈论它被发现时的情形、状况等等。<sup>③</sup> 之后，早期著作这一版包含的与此相关的说明不仅非常贫乏，而且大部分内容是不符合实情的。<sup>④</sup> 我们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促使朗兹胡特—迈尔把 MEGA 中的“第二”手稿的那 4 页放在 MEGA 中的“第三”手稿之后刊印；他们用“与手稿第 XXXVI 页相关”的说明解释了“第三”手稿开始于“补入第 XXXVI 页”。看来他们的假定是，马克思通过提及尚未写就的第 XXXVI 页而在第 I 页开始了他“最核心的著作”。<sup>⑤</sup>

同这一版——朗兹胡特在 1953 年出版了它的新版<sup>⑥</sup>——相比，MEGA 版的优点是明显的，以至于直至 1937 年法文版<sup>⑦</sup>的后续版本都没有再重新追溯它们的原始手稿。对缩减到最低限度的描述性说明的引用具有一种宗教仪式般的特征，但这种仪式未被赋予任何意义。例如这表现在：蒂尔有时把“序言”归入“第一”手稿，有时把它归入“第三”手稿。<sup>⑧</sup>

同朗兹胡特—迈尔的版本——它总是用单数谈到手稿——一样，MEGA 通过把不同的“论文”概括在统一的标题下，通过把“序言”前置，把各个部分整理排列，通过把

①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代表在 20 年代能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务档案馆保存的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遗产制作复制件。1928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委会不再允许继续制作复制件。相关内容参见：保·迈尔：《社会民主党党务档案馆的历史和马克思恩格斯遗产的命运》（“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社会历史文库》（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第 6—7 卷（1966—1967 年），第 71—72 页；海·施戴恩，迪·沃尔夫：《伟大的遗产：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历史报道》（Das große Erbe, Eine historische Reportage um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柏林：1972 年，第 85 页起。

② 朗兹胡特与迈尔：《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 1 卷），莱比锡：1932 年，第 285 页。

③ 迈尔：《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第 154 页：“在卡尔·马克思的手稿遗产中有一部未出版的著作。”

④ 朗兹胡特与迈尔：《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 1 卷），莱比锡：1932 年，第 285 页：“手稿……包含 49 张……多半是两页都写了字的对开纸面（Folioblätter）[!]，它们被并不十分内行地编排成一部文献，并且其中另有 23 页没有写字。”（事实上，它涉及的是 49 个写了字的页面）

⑤ 同上书，第 287 页。

⑥ 朗兹胡特主编：《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Die Frühschriften），斯图加特：1953 年。

⑦ 卡·马克思：《哲学著作》（Oeuvres philosophiques），J. 摩利托尔（J. Molitor）译，第 6 卷：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E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Idéologie allemande (1re partie)]，朗兹胡特与迈尔主编，巴黎：1937 年。

⑧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目录》，第 132、133 页。



那些“论文”同它们“直接的准备阶段”，即在该卷第二部分以八点活字刊印的摘录分隔开来等等方式，制造出这样的印象：《手稿》是一部特殊的“著作”（Werk）。此后，大多数作者实际上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看法是，尽管那些文本从形式上看是残缺的、未完成的、需要修改的，但从内容上看却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即马克思在其“序言”中提到的那些研究的可以系统地解释的成果。仅就形式而言，诸如“难以看穿的编排”<sup>①</sup>自然显得无关紧要；的确，因为手稿总归没有完成，所以形式本身就显得不重要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各个作者对那部“著作”——按照通常的观点，它即便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马克思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了不同的界定：一些作者依据朗兹胡特—迈尔的见解考虑手稿Ⅲ、Ⅱ、Ⅳ，一些作者考虑手稿Ⅰ—Ⅲ，一些作者考虑手稿Ⅰ—Ⅳ。在后两种情况下，一些作者只包括了“第一”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最后部分。例如蒂尔认为，其余部分都能够删掉，因为“系统的内容……很少”<sup>②</sup>；弗洛姆亦是如此，他只是在一个脚注中附带说明了删除活动。<sup>③</sup>一些人最终把“手稿”的称谓从Ⅰ—Ⅳ扩展到了MEGA中出版的摘录。甚至关于名称也一直没有作过必要的澄清。看来，人们忽略了“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标题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例如贝尔就认为，这个标题对马克思的发展过程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在这部著作中特别清楚地看出：“它作为人类学开始，作为政治经济学结束”！<sup>④</sup>

同样，那些和阿多拉茨基一样从一开始就按照传统观点强调马克思的巴黎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们也没有对《手稿》做更为准确的研究。<sup>⑤</sup>对于持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作者来说，过渡通常不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是只有在考虑到这个著名的结论时才具有意义。且不说，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即马克思何时“已经”是这样，“不再”是那样——早已由弗·伊·列宁所确定，<sup>⑥</sup>以至于涉及这些问题时它已成为圣谕。进一步讲，作为结果的东西似乎成了马克思从一开始——至少自1843年底起——就毫不动摇地驶向的目标。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披着他那不同寻常的哲学外衣的马克思可能会引起混乱的担忧，长期支配着一种极为明显的认识上的漠不关心。尼·伊·拉宾（Н. И. Лапин）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书讯中认为，在分析青

①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目录》，第10页。

②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目录》，第131页。

③ 埃·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x页（注释4）。

④ 丹·贝尔：《异化的“再发现”：在追寻历史的马克思过程中所作的一些笔记》，第940页。

⑤ 弗·阿多拉茨基，“导言”，第Ⅸ页。

⑥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95页。

年马克思的思想传记时有必要特别地回想起“列宁”行动的第一原则，即“利用一切同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这是不言而喻的。<sup>①</sup> 这个说明看来是针对直到 50 年代中期依然存在的、对在西方已被多次引用的《手稿》的近乎完全的无视。例如，格·曼德（G. Mende）在 1954 年出版的关于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者发展的著作中甚至连《手稿》提都没提；直到在 1960 年的第三版中，他才承认，人们不能完全跳过“马克思的”这些“准备材料而进入到一部……更伟大的著作”<sup>②</sup>。

虽然科尔纽于 1954 年 11 月在柏林科学院所作的报告<sup>③</sup>——它是在卢卡奇的一篇论文之后出现的<sup>④</sup>——显然标志着一种转折，但是在那之后相关论文的数量起初仍然很少。总的来说，这些论文并没有超出阿多拉茨基当初所勾勒的框架，即明确地强调《手稿》——马克思在其中同时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的被称为“不成熟的”经济学内容。<sup>⑤</sup> 狄茨出版社的新版就符合这一观点。它肢解了《手稿》：把“第三”手稿中包含的关于黑格尔的段落收录到 1953 年出版的文集《〈神圣家族〉和其他早期哲学著作》中；<sup>⑥</sup> 相反，把第 I—III 手稿的其余部分——马克思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收录到 1955 年出版的文集《短篇经济学著作选集》中。<sup>⑦</sup> 1957 年，亨·德尼

① 俄文版参加尼·伊·拉宾：《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Борьба вокруг идей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молодого Маркса），1962 年莫斯科版；德文版参见拉宾：《文献之镜中的青年马克思》（Der junge Marx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1965 年柏林版，第 39 页。

② 格·曼德：《卡尔·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发展》（Karl Marx' Entwicklung vom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ten），1954 年柏林版；1955 年柏林第 2 版；1960 年柏林第 3 版，第 132 页。

③ 马克思著，奥·科尔纽主编：《经济学哲学手稿》（Die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1955 年柏林版。

④ 格·卢卡奇：《论青年马克思（1840—1844 年）的哲学发展》（“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 (1840—1844)”），《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第 2 卷（1954 年），第 288—343 页。

⑤ 俄文版参见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В Сороковые Годы XIX Века），1954 年；德文版参见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Lehr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des 19. Jahrhunderts），1958 年柏林版，第 83—203 页；沃·雅恩：《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劳动异化概念的经济学内容》（“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s Begriffes der Entfremdung der Arbeit in den Frühschriften von Karl Marx”），《经济学》（Wirtschaftswissenschaft），第 5 卷（1957 年），第 848—865 页。

⑥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Kritik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und Philosophie überhaupt”），《〈神圣家族〉和其他早期哲学著作》（Die Heilige Familie und andere 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马克思和恩格斯著），柏林：1953 年，第 67—98 页。

⑦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哲学手稿》（“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短篇经济学著作选集》（Kleine ökonomische Schriften, Ein Sammelband，马克思和恩格斯著），柏林：1955 年，第 42—166 页。

(H. Denis) 通过断言“著名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汇集了马克思当时在阅读时所写下的笔记”<sup>①</sup> 而表达了一直以来仍然流行的倾向：即便不忽视《手稿》，<sup>②</sup> 也要轻视《手稿》。德尼所使用的单数形式已经表明，这个论断不是源于资料考证性的见解，而是源于论战性的目的。这一点可以由下述情况更加清楚地证明：在上述作者中，没有一位对《手稿》作过相应的分析；相反，他们对资料考证的漠视并不亚于他们的论敌。例如，科尔纽就这样解释说，马克思在《手稿》中以黑格尔批判为“出发点”(!)；据此，他首先介绍了“第三”手稿中的相关段落，以便之后断定，马克思是从这一黑格尔批判出发着手展开他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的。<sup>③</sup> 曼德认为，他能够向“马克思的歪曲者”指出：“一部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著作 [由谁命名? ]”几乎不可能包含“人类学”。<sup>④</sup>

为了应对在《资本论》中读出《手稿》的倾向，但也同样批评相反的倾向，路·阿尔都塞 (L. Althusser) 在 1961 年发表的文章《论青年马克思》中持这样一种观点<sup>⑤</sup>，它很快就被简缩为下述论点：晚年马克思的“科学的”著作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性的”著作被认识论的断裂分隔了开来。<sup>⑥</sup> 然而，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太多认同。与此同时，由于对晚年马克思的兴趣衰减，青年马克思的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拉宾在 1962 年指出，“对这条道路的认识帮助许多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见解……这尤其适用于年轻人”<sup>⑦</sup>。这一信念也表现在《手稿》价值的提升上。例如，列·巴日特诺夫 (Л. Пажитнов) 在俄文一版《手稿》<sup>⑧</sup> 出版后这样宣称，“1844 手稿构成了马克思在社

---

① 亨·德尼：《他们理解〈资本论〉吗？》(“Ont-ils compris Le Capital?”)，《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天主教批判者的回应》(Les marxistes répondent à leurs critiques catholiques)，亨·德尼、R. 加劳迪 (R. Garaudy)、G. 科尼奥 (G. Cogniot)、G. 贝斯 (G. Besse) 主编，1957 年巴黎版，第 20 页。

②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 并没有在自 1957 年出版的前几卷中的某一卷收录《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是在 1968 年才将其收录到某一补充卷中。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Werke) (增补卷第 1 卷)，柏林：1956—1968 年，第 465—588 页。

③ 马克思著，奥·科尔纽主编：《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10 页及以下几页。

④ 格·曼德：《卡尔·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发展》(第 3 版)，第 159 页。

⑤ 路·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Sur le jeune Marx’ (Questions de théorie)”), 《思想》(La Pensée)，第 96 期 (1961 年)，第 3—26 页。

⑥ 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Pour Marx)，巴黎：1965 年，第 11—32 页。

⑦ 拉宾：《文献之镜中的青年马克思》，第 6 页。

⑧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1844 год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集》(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莫斯科 1956 年版，第 517—642 页。

会科学方面所发动的革命性转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由此确立”<sup>①</sup>。与之相应，自60年代初以来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问世，如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二卷。<sup>②</sup>然而，虽然科尔纽在该卷中认为，《手稿》——马克思在其中“连贯地阐述了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从而为《手稿》让出了宽裕的空间，<sup>③</sup>但是他的阐述始终缺乏一种关于那部“著作”的先行的精确分析，因此仍是概括性的。1962年出版法文新版《手稿》<sup>④</sup>的埃·博蒂热利（E. Bottigelli）则看得远为准确。在导言中，他不仅强调了《手稿》的未完成、不太同质的特征，而且使我们回想起“序言”处于“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因此，这仅仅是接近马克思本来打算将其写成一部完整作品的那部著作的结尾”。<sup>⑤</sup>他第一个指出，《手稿》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正处于变动之中：“它们并不是关于某种学说的系统阐述，它们是一种自我形成的思想的沸腾……这种思想几乎完全挣脱了它从中汲取营养的那些要素的束缚。”<sup>⑥</sup>然而，他并没有把对各部著作——它们滋养了马克思的思想——所作的摘录纳入考察范围。直到1968年，拉宾才在他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指出，那个直至当时仍处于支配地位的看法——马克思先作了那些摘录，然后才写了我们所说的文本——是错误的。<sup>⑦</sup>拉宾认为，毋宁说我们可以区分出这样两个阶段：在第一系列摘录（萨伊、斯卡尔培克、萨伊、斯密）之后出现了“第一”手稿；然后，在新的一系列摘录（麦克库洛赫（J. R. McCulloch）、普雷沃（G. Prevost）、恩格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李嘉图、穆勒）之后出现了其余的手稿。<sup>⑧</sup>

虽然拉宾的考察——它涉及资料考证的精确性——无疑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① 俄文版参见：列·巴日特诺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У исток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в философии），《共产主义者》（Kommunist），1958年第1期，第88—100页；法文版参见：列·巴日特诺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Les ‘Manuscrits économique-philosophiques de 1844’”），《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第19期（1960年），第117页。

② 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eben und Werk），第2卷，柏林：1962年。

③ 同上书，第116页。

④ 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手稿》[Manuscrits de 1844 (Economi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埃·博蒂热利主编，1962年巴黎版。

⑤ 埃·博蒂热利：《导言》，同上书，第XXXVIII页。

⑥ 同上书，第XXXX页。

⑦ 参见尼·伊·拉宾：《青年马克思》（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1968年莫斯科版；德文版参见尼·伊·拉宾：《青年马克思》（Der junge Marx），柏林：1974年；中文版参见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北京版。

⑧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32页。

但是他在莫斯科的复制件基础上给出的《手稿》图景仍然是不准确的。通过研究众所周知的自30年代以来就保存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原件，一项独立的工作开启了；与之同时进行的是新MEGA相关卷次的稍晚阶段的准备工作——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同样为之提供了原件。<sup>①</sup>从这些原件包括可以考虑的摘录笔记本出发，备受讨论的《手稿》诞生过程得到了相当精确的重建，因此它的特点更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 三

我们先按照书目号——从现在起用它们来称呼各个笔记本——的顺序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遗产中的原件作一番描述<sup>②</sup>：首先是所谓的“手稿”，然后是摘录笔记本。

#### A “手稿”

由旧版MEGA编者引入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名是指三束由不带横格的、最初是白色而现在褪为棕色的、马克思书写的最廉价的一种纸（没有水印）所做成的部分不均匀地裁剪好的印张或半印张（=纸面）。个别横向折叠的印张拼合成笔记本，或者

---

① 在准备相关卷次时，有关个别问题的几篇文章诞生了：格·巴加图利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特点》（“Начало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алектико-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历史—内容—方法论》（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стория-Содержание-Методология，格·巴加图利亚、维·维戈茨基著），莫斯科：1976年，第207—222页；英·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Pr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von Karl Marx”），《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1978年第3期，第17—35页；奈·鲁缅采娃：《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在MEGA第IV部分第2卷中的出版》（“Zur Veröffentlichung der Pariser Hefte von Karl Marx im Band IV/2 der MEGA”），《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Engels-Jahrbuch）（第3卷），1980年，第275—293页。新MEGA中收录马克思的巴黎摘录（直至布阿吉尔贝尔摘录）的卷次于1981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sup>2</sup>），第IV部分第2卷，柏林：1981年，第279—579页。收录手稿本身的第I部分第2卷——现在同样出版了——在本文完成时尚未出版。我打算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两卷。

② 使用的缩写：Bl. = Blatt（纸面）；S. = Seite（页）；R = recto（右页）；V = verso（左页）；(l./r.) Sp. = (linke/rechte) Spalte（左/右栏）；o. = oben（顶部），即直接从页面上部边缘起；Mo. = 在上部的三分之一处；M. = 在中部的三分之一处；Mu. = 在下部的三分之一处；u. = unten（底部），也就是直到页面的下部边缘。“第I页”、“第IV页”等说明只同马克思的页码编号有关。“横向书写”是指页面是正常书写的，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书写的——印张折叠处构成了它的左边缘或右边缘；相反，纵向书写是指页面是这样书写的——印张折叠处构成了它的上部边缘。



成为笔记本的一部分。若是如此，那么马克思就纵向书写笔记本的各页。

#### A7/ [B95]<sup>①</sup>

所谓“第一手稿”（参见附录）由缝成一个笔记本的9个规格为 $\pm 395 \times \pm 310$ 毫米的印张构成（18纸面，36页）。这个笔记本没有封皮。部分纸面松开了。第1纸面右页写着标题“笔记本I”，第1纸面左页是空白的。在第2纸面右页，马克思记下了29本书的标题。接下来几页（第2纸面左页至第5纸面右页）又是空白的。马克思用罗马数字编了页码的其余27页（第5纸面左页至第18纸面左页）被竖线分成三栏（第I—Ⅻ页，Ⅺ—XXⅦ页）或两栏（第Ⅻ—ⅩⅥ页），马克思把它们命名为[A]“工资”、[B]“资本的利润”（“资本盈利”，“资本的盈利”，“诸资本的盈利”）<sup>②</sup>、[C]地租。在这里，次序是变动不定的。在第I—Ⅻ页，次序是A、B、C；第Ⅻ—ⅩⅣ页是A、B；第ⅩⅣ页是C、B，第Ⅺ—ⅩⅠ页是A、C、B；第Ⅹ、Ⅺ—ⅩⅩⅤ页是A、B、C，第ⅩⅩⅥ页是A、C、B；第ⅩⅩⅦ页是A、B、C。在第Ⅶ页，马克思在第二栏中继续进行第一栏（A）的文本的写作，然后，他以一条横线为间隔，又在这一栏开始写关于“工资”这个主题的文本，并在第三栏中结束了该部分内容。在第ⅩⅣ页，第二栏（C）实际上包含着关于“资本盈利”的文本。从第ⅩⅦ页起，所有三栏都包含关于“异化劳动”的连贯文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页码编号——应该强调的是，这一编号在该笔记本第10页（第5纸面左页）上才开始——的进展：ⅪⅦ，I，ⅩⅥ，ⅩⅤ，ⅩⅣ，……，Ⅳ，Ⅲ，Ⅱ，ⅩⅩ，ⅩⅩⅠ，……，ⅩⅩⅦ。第Ⅺ—ⅩⅣ页的第一栏，第I—ⅩⅥ页的第二栏、第I—Ⅹ页的第三栏的文本主要由对以下著作的摘录构成：萨伊，《论政治经济学》，2卷，1817年巴黎第3版；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尔涅新译本，5卷，1802年巴黎版；威·舒尔茨（W. Schulz），《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康·贝魁尔（C. Pecqueur），《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查·劳顿（Ch. Loudon），《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欧·比雷（E. Buret），《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2卷，1840年巴黎版。

#### A8 [A6]

所谓“第二手稿”由两张规格为 $? \times \pm 310$ 毫米的松散的纸面（4页）构成。<sup>③</sup>这两张纸面最初是否有关联，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一个印张已经无从得知了。这四页纸分

① 括号里的书目号是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旧”书目号。

② 德文原文为：[B] “Profit d [es] Capitals”（“Capitalgewinn”，“Gewinn d [es] Capitals”，“Gewinn d [er] Capitalien”）。也可参见本文附录的笔记本A7的图示。——译者注

③ 这两个纸面在印张折叠处碎裂严重。

别被一条竖线划分为两栏。它们包含着一个连贯写就的文本，这个文本从第一页左栏顶部的句中开始，在第四页右栏的下部三分之一处中断。在当前的状况下，我们只能看出马克思用罗马数字给各页编了页码；它不再是旧版 MEGA 中所列的数字（XXX—XLIII）。<sup>①</sup>

A9 [A6]

所谓“第三手稿”（参见附录）由 16 个规格为  $\pm 400 \times \pm 310$  毫米的印张（32 纸面，64 页）构成。它连同在中间插入的作为“第四手稿”（参见下文）的那些印张一起被缝成了一个没有封皮的笔记本。部分纸面松散了。马克思用罗马数字编了页码的、总是被一条竖线分为两栏的前 41 页写了字，但页码却一直编到了 XLIII，因为马克思一时疏忽，在编完 XVII 页后就跳到了 XXV 页。这 41 页按照下列的顺序包含着旧 MEGA 中出版的文本：第 I 页左栏顶部至第 XI 页左栏底部：MEGA<sup>1</sup> 第 I 部分第 3 卷，第 107 页第 2 行至第 126 页第 8 行；第 XI 页右栏顶部至第 XIII 页右栏底部：同上书，第 150 页第 3 行至第 154 页第 39 行；第 XIV 页左栏顶部至第 XVII 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同上书，第 127 页第 2 行至第 133 页第 13 行；第 XVII 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至第 XVIII 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同上书，第 154 页第 39 行至第 156 页第 28 行；第 XVIII 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至第 XXI 页右栏底部：同上书，第 133 页第 14 行至第 138 页第 11 行；第 XXII 页左栏顶部至第 XXXIV 页左栏中部三分之一处：同上书，第 156 页第 29 行至第 172 页第 32 行；第 XXXIV 页左栏中部三分之一处至第 XXXVIII 页左栏底部：同上书，第 138 页第 12 行至第 144 页第 38 行；第 XXXX 页左栏顶部至第 XL 页右栏底部：同上书，第 33 页第 2 行至第 35 页第 45 行，即“序言”；第 XLI 页左栏顶部至第 XLIII 页右栏底部：同上书，第 145 页第 2 行至第 149 页第 44 行。其余 23 页空白。

A9 \* [A6]<sup>②</sup>

所谓“第四手稿”由一个插入“第三手稿”中间部分的规格为  $\pm 400 \times 310$  毫米的印张（2 纸面，4 页）构成。这些（直到第 4 页）没有编页码、没有分栏、连贯写下来的页面包含着对乔·威·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约·舒尔茨（J. Schulze）主编，《黑格尔全集》第 2 卷，1832 年柏林版，也可能是 1841 年柏林第 2 版] 的摘录，

<sup>①</sup> 就连朗兹胡特与迈尔也只能辨认出“XLI”。参见朗兹胡特与迈尔：《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 360、362、364、366 页。

<sup>②</sup> 在 A9 中缝入的印张没有独立的书目号。

即对“绝对知识”章的摘录。

#### B 摘录笔记本

我们非常确定的、在马克思 1843—1845 年逗留巴黎期间诞生的各个笔记本同样是由不带横格的，最初为白纸的若干横折的、堆集在一起（在修复前缝在一起）的印张构成。纸的质量、规格、书写方式不尽相同。

##### B19 [B19]

它由 8 个规格为  $400 \times 310$  毫米的印张（16 纸面，32 页）构成。前 25 页（第 1 纸面右页至第 13 纸面右页 = 第 1 - 25 页）被马克思后来用阿拉伯数字编了页码，横向书写。每一页都被一个折痕分成两栏。

（左栏）

a) 第 1 页顶部至第 25 页中部三分之一处：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 年巴黎第 3 版，2 卷）的摘录。

（右栏）

b) 第 1 页顶部至第 4 页上部三分之一处：对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1829 年巴黎版，2 卷）的摘录。c) 第 4 页中部三分之一处：对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1836 年布鲁塞尔第 3 版）的摘录。

第 15 页中部三分之一处到下部三分之一处：马克思对 a) 的评注。

接下来各页——直至包含着求解  $(10+6)?$  的一页（第 14 纸面右页）——是空白的。

##### B20 [B20]

它由 6 个规格为  $272 \times 206$  毫米的印张（12 纸面，24 页）构成。前 23 页被马克思后来用阿拉伯数字编了页码，没有分栏，横向书写。它们包含着对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 年巴黎版，5 卷）前两卷的摘录（马克思在第 4 页作了较简短的评注，后来又在第 9 页作了补充）。起初空白的最后一页包含着计算。

##### B21 [B23]

它由 7 个规格为  $300 \times 227$  毫米的印张（14 纸面，28 页）构成。两个外纸面（第 1 和 14 纸面）形成一张封皮。第 1 纸面右页有马克思写的标题“波恩 1842”；在它的上面写着“吉本”；在它的下面，马克思写下了他在笔记本中已经摘录或打算摘录的著作的作者（有的也包括书名）。左下方是恩格斯纵向写的“有人死就有人生”（Den eenen zijn' dood/ Is den anderen brood）。第 1 纸面左页是空白的。接下来的被马克思用阿拉

伯数字编了页码的9页(第2纸面右页至第6纸面右页=第1-9页)都是纵向书写的,每一页都被一条竖线分成两栏。

a) 第1页至第3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吉·普雷沃译,1825年日内瓦—巴黎版)的摘录(第2、3页有马克思的简短评注)。b) 第3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至第9页右栏上部三分之一处:对吉·普雷沃的附录《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的摘录(第5、6、7、8、9页有马克思的较长评注)。接下来一页未编页码、未分栏,并且同样是纵向书写的。它包括:c) 从顶部到下部三分之一处: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1844年巴黎版,第86—114页)。接下来各页(第7纸面右页至第11纸面右页=第10—18页)又编了页码,又被竖线分为两栏,并且是纵向书写的。d) 第10页左栏顶部至第12页右栏底部:对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第4卷(1826年巴黎第2版)的摘录。e) 第13页至第18页右栏下部三分之一处,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J. T. Parisot)译,1823年巴黎版)的继续摘录(第17页有马克思的评注)。

下一页(第11纸面左页)是横向书写的,未编页码。它只包含着标题“5) 边沁,前引著作”。剩余各页是空白的。

#### B23 [B22]

它由9个规格为 $\pm 395 \times \pm 310$ 毫米的印张(18纸面,36页)构成。前两页(第1纸面的右页—左页)未编页码、未分栏,是横向书写的。a) 第1纸面右页顶部至第1纸面左页中部三分之一处:对《雅典的色诺芬的著作集》第9—10卷(A. H. 克里斯蒂安译,1828—1830年斯图加特版)的摘录。其余34页以罗马数字编了页码,分别用竖线分为三栏(第I—II页)或者两栏(从第III页起),并且全部纵向书写。由于马克思一时疏忽用了两次XXV,因此页码编号只达到了XXXIII。b) 第I页至第XVII页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F. S. 康斯坦西奥(F. S. Constancio)译,2卷,1835年巴黎第2版)的摘录(第I、III—IV、V—VII、XI—XIII、XIV—XV页有马克思的较长评注)。c) 第XVIII页至第XXXIII页右栏底部: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的摘录(第XXV—XXX页,第XXXI页至XXXIII页右栏底部有马克思的详细评注)。

#### B24 [B25]

它由11个规格为 $\pm 400 \times 310$ 毫米的印张(22纸面,44页)构成。前21页(第1

纸面右页至第 11 纸面右页) 未编页码, 横向书写, 并且每一页都被一条折痕分为两栏。

a) 第 1 纸面右页左栏顶部至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 对卡·沃·克·许茨 (C. W. Ch. Schüz) 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43 年蒂宾根版) 的摘录。

第 1 纸面左页至第 10 纸面右页:

b) (左栏:) 对弗·李斯特 (F. List) 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 (1841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 的摘录 (第 5 纸面左页有马克思的评注)。

c) (右栏:) 对亨·弗·奥西安德 (H. F. Osiander) 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1842 年蒂宾根版) 的摘录。

d) 第 10 纸面左页左栏顶部至下部三分之一处: 对奥西安德的《论民族的商业交往》第一卷 (2 卷, 1840 年斯图加特版) 的摘录。e) 第 11 纸面右页左栏顶部至右栏中部三分之一处: 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译, 2 卷, 1835 年巴黎第 2 版) 第 XXVII 章的摘录。

接下来一页是空白的。之后的四页 (第 12 纸面右页至 13 纸面左页) 包含一些计算。其余 18 页是空白的。

B25 [B26]

它由 5 个印张 (10 纸面, 20 页) 加一个附上的印张 (2 纸面, 4 页) 构成, 规格均为  $265 \times 206$  毫米。所有这 24 页都被马克思后来用阿拉伯数字编了页码, 没有分栏, 横向书写。它们包含着对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 (1840 年巴黎版) 的摘录。

B26 [B21]

它由 9 个印张 (18 纸面, 36 页), 也就是 8 个规格为  $400 \times 310$  毫米的印张加 2 个半印张 (第 1 纸面和第 10 纸面) 构成。在修复时, 第 1 纸面 (文本有缺损, 尤其是顶部) 同接下来的印张粘在了一起, 第 10 纸面粘到了中间的印张中。前 21 页 (第 1 纸面右页至第 11 纸面右页) 是横向书写的; 从第 9 纸面左页起, 它们才被分成两栏; 从第 10 纸面起, 它们才被一条折痕分成两栏。马克思用阿拉伯数字对这些页面编了页码, 有些是在他书写这些页面之前编的 (墨水: 3, 4, 6, 7, 10, 11, 13, 20)。在这里, 他由于疏忽给包含着对让·罗 (J. Law) 的摘录的第 21 页 (第 11 纸面右页) 写上了数字 20, 后来, 他再次事后对包含布阿吉尔贝尔摘录的前 20 页 (第 1 纸面右页至第 10 纸面左页) 编了页码 (铅笔: 1—20)。所有的摘录均出自文集《18 世纪的财政经济



学家》(欧·德尔(E. Daire)主编, 1843年巴黎版)。

a) 第1页至第5页中部三分之一处: 对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 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以及救济的难易程度》(《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第171—266页)的摘录。  
b) 第5页中部三分之一处至第15页下部三分之一处: 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第394—424页)的摘录(第12—15页有马克思的详细评注)。  
c) 第16页顶部至第20页左栏上部三分之一处: 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第352—393页)的摘录。  
d) 第20\*页: 对让·罗的《论货币和贸易》(《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第465—548页)的摘录。

下两页(第11纸面左页, 12纸面右页)是空白的。接下来5页(第12纸面左页至第14纸面左页)是纵向书写的, 未分栏, 未编页码。它们包含着马克思后来作的关于罗马史的概要。其余8页是空白的。

除了这些笔记本之外还有一个莫斯科笔记本(Moskauer Heft, 简称MH), 也就是说, 这个摘录笔记本的原件保存在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书目号: 全宗第1号, 目录第1号, 卷宗第124、127号)。<sup>①</sup>

#### MH

它由7个规格为400×310毫米的印张(14纸面, 28页)构成。前17页——第7—17页后来用阿拉伯数字编了页码(接续笔记本B20: 第24—34页)——都用一条折痕分成两栏, 横向书写。

a) 第1纸面右页至第3纸面左页:

(左栏)对勒瓦瑟尔《回忆录》(四卷, 1829—1831年巴黎版)的摘录;

(右栏)关于勒瓦瑟尔《回忆录》的德语摘要。

b) 第4纸面右页至第9纸面右页(两栏): 对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继续摘录。

接下来未编页码的一页(第9纸面左页)只包含一个标题: “第Ⅳ卷, 第五篇, 论君主的收入……”。其余十页是空白的。

除了马克思在1843—1845年的巴黎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一个从那时开始写的笔记本和一些书信以外, 前面的概述涵盖了所有现存的马克思在那一时期写的东西。这些材料可以按照前面给出的外部特征进行不同的归类。

<sup>①</sup> 关于对这个笔记本的描述可参见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 第727—728页。

1) 按照纸张(质量、规格), A7、A8、A9、A9\*、B19、B23、B24、B26、MH 构成独立一组。就此而言, 小规格的笔记本 B20、B21、B25 显然不属此列, 它们由不同类型的信纸构成。

2) 按照书写方式:

—横向, 未分栏: B20、B23a、B25、B26a、B26b、B26c (第 16—17 页);

—横向, 用折痕分栏: B19、B24、B26c (第 18—20 页)、B26d、MH;

—纵向, 未分栏: A9\*、B21c;

—纵向, 用竖线分栏: A7、A8、A9、B21a、B21b、B21d、B21e、B23b、B23c。

3) 按照页码编号的形式:

—没有页码: A9\*、B21c、B23a、B24、MHa;

—阿拉伯数字: (B19)、(B20)、B21a、B21b、B21d、B21e、(B25)、B26、(MHb);<sup>①</sup>

—罗马数字: A7、A8、A9、B23b、B23c。

可以确定, 按照这三种标准, “手稿”都不能构成一个界限分明的组群。

从内容的类型上看, “手稿”同样很难立刻与其他笔记本划清界限, 由此这个论断就具有了意义。尽管“手稿”本身不仅包含马克思的文本, 而且这一文本在 A7 中是在很大程度上、在 A9\* 中则是完完全全地由摘录构成, 但是其他几个笔记本也不仅包含摘录, 同样包含马克思自由阐发的文本, 有的篇幅还很长。甚至按照诞生时间来说, 《手稿》似乎也没有与其他笔记本泾渭分明。因此,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手稿”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复合体。

这一概述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就马克思在写满他的笔记本时采用的形式来说, 他的处理是相当随意的, 以至于他有时任意地改变这种形式, 然后又在一段时间内出于习惯保持新形式。然而, 更精确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的形式通常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另外, 即便最初的目的被忘却了, 但是特定的功用却实现了。我们同时可以看出, 在某些情况下, 特定的形式是与特定类型的内容相符合的。马克思的两个摘要便是如此。他做这两个摘要不是为了获取新知识, 而是为了再次回忆起早已读过的内容(A9\*, B21c)。例如, 在 B21 中, 他在未编页码的那一页——它包含着同样在封皮上就转而进行的恩格斯摘要(B21c)——之后继续前面各页的页码编号, 这表明, 就形式而言马克思并不是纯粹机械地进行摘录的。

<sup>①</sup> 带括号的文本是马克思后来才编了页码的。

## 四

独立的原始资料可以使我們获得某些补充说明，这里简要参考一下。在被多次引用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本人谈到，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sup>①</sup>他是在1843年10月中旬到达那里的。<sup>②</sup>直到1844年2月，马克思都在忙于准备《德法年鉴》的前两期，他本人也为之撰写了两篇文章。<sup>③</sup>1843年12月19日，卢格（A. Ruge）写道，马克思“做完了”，很可能与此有关。<sup>④</sup>但是，卢格在1844年2月5日写的一封信表明，除此之外，马克思后来还答应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续篇”<sup>⑤</sup>。马克思本人在A9所包含的“序言”中也提到，他试图对这部续篇“加工整理以便付印”。另外，从“序言”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最终得出结论，复杂的资料并不适于按照他计划采用的形式来阐述。由此可以设想，他那看似只是形式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内容的问题。<sup>⑥</sup>5月15日，卢格谈到，马克思太激动了，尤其“在他带病工作的时候”；他读了很多书，但没有一本是读完的，而是时时中断，因而“总是一再地投入到无尽的书海中”；他现在计划写“国民公会史”；相关资料他已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② 参见阿·卢格致尤·福禄培尔（J. Fröbel）：《1843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Engels-Jahrbuch）（第1卷），1978年，第380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法年鉴》第1-2期（1844年），第71-85页，或MEGA<sup>1</sup>第I部分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7年，第607-621页；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德法年鉴》第1-2期（1844年），第182-214页，或MEGA<sup>1</sup>第I部分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7年，第576-606页。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214、163-198页。

④ 《卢格致福禄培尔》（1843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卷），1978年，第382页。

⑤ 《卢格致路·费尔巴哈》（1844年2月5日），同上书，第384页。“我们面前已经有了印刷好的10个印张。内容是：1、……4、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2、马克思关于第4项的续篇；13、报刊瞭望”。英·陶伯特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一文的第17页得出，对于第二期来说，看来已经有了第一个续篇；马克思手中有它，因为它没有被收录在前两期的合刊中，“很可能是被撤了回去”。对之构成反驳的是，卢格所列举的那些文章——不包括马克思的“续篇”——已然产生了共计237页的两期合刊，但是“10个印张”只是160页，因此卢格给出的“内容”不可能是现有的“已经……印刷好的10个印张”的内容。看来，在卢格所列举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还不存在或者至少没有印刷出来，其中就可能包括马克思的“续篇”。就那篇文章而言，我们可以设想，马克思起初允诺要写它，但之后并没有把它寄出去。马克思在A9所包含的“序言”开头的相关段落中使用的虚拟式（“才能”，“又会造成”）与此正相适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220页。

经“积累”好了，“他再次放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想利用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进行那项工作”。<sup>①</sup> 7月9日，卢格写道：“他（马克思）头脑中有一个政治计划，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实现它。然后他想写国民公会史……现在看来这件事也要再次放一放了。”<sup>②</sup> 8月29日，卢格写道：“马克思思想以共产主义观点批判黑格尔的自然法，然后写国民公会史，最后写对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他总是想写他最近读过的东西。”<sup>③</sup>

在此期间，马克思在巴黎《前进报》上针对7月27日该报发表的卢格的文章<sup>④</sup>写了一篇尖锐的回应文章<sup>⑤</sup>，注明的日期为7月31日；另外，马克思在八月中旬还写了一篇更短的文章。<sup>⑥</sup> 最晚从6月中旬起，他开始考虑对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发起新的进攻。<sup>⑦</sup> 在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宣布“将出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sup>⑧</sup>。在恩格斯8月27日至9月6日访问巴黎期间，这个打算浓缩为共同进行的（后来被命名为）《神圣家族》的计划，但它几乎是马克思单独完成的。<sup>⑨</sup> 根据马克思在10月7日致尤·康培（J. Campe）的信，直到那时他已经“写了一本……小册子，篇幅大约为10个印张”<sup>⑩</sup>。这部在11月底完成的手稿产生了一部篇幅达22印张的著作；还在付印期间，马克思——直至1845年1月中旬——就多次修改了

① 《卢格致费尔巴哈》（1844年5月15日），《1825—1880年阿尔诺德·卢格的书信与日记》（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第一卷），保·奈尔里希（P. Nerrlich）主编，柏林：1886年，第343—345页。

② 《卢格致M. 弗莱舍》（1844年7月9日），同上书，第362页。

③ 《卢格致M. 敦克尔》（1844年8月29日），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第19页。

④ 一个普鲁士人 [卢格]：《普鲁士国王与社会改革》（“Der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Socialreform”），《前进报》（Vorwärts!），1844年第60号（7月27日），第4页；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第587页及以下几页。

⑤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前进报》1844年第63号（8月7日），第1—4页；第64号（8月10日），第1—3页；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第5—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5—396页。

⑥ 马克思：《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前进报》1844年第66号（8月17日），第2—3页；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第24—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7—401页。

⑦ 参见《燕妮致马克思》（1844年6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4页。“虽然他 [罗·施莱歇尔] 也认为你们一伙人是半疯，但是他觉得，你早就应当向鲍威尔进攻了。卡尔啊，你尽快实施你的设想吧……只是写东西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许多，这你是知道的。”这封信表明，燕妮“早在八天”前就离开巴黎，自此之后她还没有收到马克思的任何书信。

⑧ 《马克思致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⑨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

⑩ 《马克思致尤·康培》（1844年10月7日），同上书，第324页。

它。<sup>①</sup> 1844年12月2日,他允诺伯恩施太因(H. Börnstein),“下星期”会为计划中的《前进报》月刊“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sup>②</sup>。1845年2月1日,也就是在即将启程离开巴黎之前马克思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马克思要向C. W. 列斯凯(C. W. Leske)的位于达姆施塔特的出版社提交一部两卷本著作,其中每卷超过20印张。这部著作不仅会包含对政治的批判,而且同样会包含对国民经济学批判。<sup>③</sup>早在1844年10月初恩格斯就催促马克思,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sup>④</sup>;在1845年1月20日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敦促马克思尽快写完他的“国民经济学著作”<sup>⑤</sup>。在3月17日的信中,恩格斯最后一次提到了可能同样还是在巴黎产生的马克思的计划:为皮特曼(H. Püttmann)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写文章“批判李斯特”<sup>⑥</sup>。它的萌芽已经包含在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参见下文)。

## 五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我们现在几乎不仅可以确定前面描述过的那些文本的诞生时间,而且可以确定它们的诞生次序。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独立的原始资料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怀揣着各种各样的计划。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写的信是马克思打算写作一部“国民经济学著作”的首份明证。这封信同时表明,恩格斯在1844年10月的信中所说的“材料”是

---

① 参见《约·吕滕、查·勒文塔尔致马克思》(1844年12月3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1975年柏林版,第446页;《勒文塔尔致马克思》(1845年1月15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448-449页。

② 《马克思致亨·伯恩施太因》(1844年12月2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257页(那里写的时间是错误的;关于时间的确定参见施达加尔特(J. A. Stargardt)公司目录615,1978年,第323页,第1156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32页。

③ 该合同刊登在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851-8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6页,注释172。

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2页。

⑤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

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1页。



指什么。由于这封信看来是恩格斯启程离开巴黎后写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他还未曾收到过马克思的任何信件，因此这里谈到的“材料”必定已经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这一设想被马克思在7月底为《前进报》撰写的那篇文章所支持；马克思尤其在文中明确谈到“冷酷无情的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更确切地说，谈到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sup>①</sup> 他也同样含蓄地谈到了比雷的著作。<sup>②</sup> 马克思从事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间接说明包含在格·韦伯（G. Weber）7月到8月间发表在《前进报》的几篇文章中<sup>③</sup>，另外也包含在贝尔奈斯于9月6日写的一封信中。<sup>④</sup> 如果说，不是韦伯启发了马克思而是马克思启发了韦伯——一切都指向了这种情况——合乎实际的话，<sup>⑤</sup> 那么可以设想，A9中第XLI-XLIII页论述货币的篇章是先于韦伯的文章——它在8月28日发表<sup>⑥</sup>——出现的，因为马克思在其中不仅探讨了相同的主题，而且也使用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的同一段引文。这个设想本身的依据是，马克思在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对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所作的批判几乎一字不差地——即便不是在同一天写的，也可能是在此前不久写的——出现在马克思向黑格尔批判过渡的A9第XII-XIII页的段落中。在那里，他在两个情形下提到

①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9页。

②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0-384页。

③ 格·韦伯：《黑奴和自由奴》，《前进报》1844年第58号（7月20日），第1-3页；格·韦伯：《普鲁士官方的慈善活动》，《前进报》1844年第62号（8月3日），第3-4页；格·韦伯：《阿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移民区》，《前进报》1844年第64号（8月10日），第4页；格·韦伯：《货币》，《前进报》1844年第69号（8月28日），第1-3页。这四篇文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21-646页。

④ 参见《卡·路·贝尔奈斯致K. 德雷塞尔》（1844年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1844—1852年书信选》（Zeitgenossen von Marx und Engels. Ausgewählte Briefe aus den Jahren 1844 bis 1852），库·科斯齐克（K. Koszyk）与卡·奥伯曼（K. Obermann）主编，阿森—阿姆斯特丹：1975年，第7-8页：“我们想用这些小刺痛来伤害国家，——从而使这个国家像英国一样每天都认识到自己的不道德（参见罗伯特·皮尔最近关于工厂奴隶的劳动时间的演讲以及穆勒和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学）——这一点我不能理解。因此，由马克思博士、曼彻斯特的弗·恩格斯、我以及另外三名成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一致决定，不发表这首诗。”

⑤ 参见弗·皮·席勒：《格奥尔格·韦伯——巴黎〈前进报〉的一名工作人员》（“Georg Weber, ein Mitarbeiter des Pariser ‘Vorwärts’”），《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Engels-Archiv），达·梁赞诺夫主编，第2卷（1927年），第468页及以下各页；雅·格朗荣：《1844年马克思与德意志共产主义者在巴黎。马克思主义诞生研究论文集》（Marx et les communistes allemands à Paris 1844.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naissance du marxisme），巴黎：1974年，第72页。

⑥ 格·韦伯：《货币》，《前进报》1844年第69号（8月28日），第1-3页。

了8月初格·荣克(G. Jung)寄给他的那几期《文学总汇报》。<sup>①</sup>

如果黑格尔摘要(A9\*)不是在马克思写作A9之前出现的,那么它就是在马克思写作A9期间出现的,最晚是在开始于A9第XXXIII页的、马克思在其中特别研究“《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的那个段落之前出现的。<sup>②</sup>由于A8的四页编号(XXXX-XLIII)与A9最后写的那几页——它们后面还有23页是空白的——的页码编号是并行的,因此很难假定,A8是接续A9的。较可靠的假设是,A8的四页构成了马克思在A9开头中谈到的那一文本的结尾。

笔记本A7可能是在A8、A9之前产生的,因为当马克思写作A7时,他看起来对A8、A9中提到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不熟悉。同时,A7揭示了用竖线对纵向放置的页面进行分栏——起初是三栏——的原初目的:这样一种分栏很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偏爱短行。马克思之后不仅在A8、A9中,而且同样在B21、B23中进行了分栏。这些笔记的相关部分(B21a-b, B21d-e, B23b-c)同样是在A7之后出现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在A7中依据比雷的著作引述了李嘉图,他看来把比雷可能意在解释的、但是以一种误导的形式确定的对技术性术语“地租”的说明当成了李嘉图著作的标题。<sup>③</sup>因此,看来马克思当时甚至连这部在B23b中被摘录的著作的名字都不知道。由此可以得出,他当时同样对在B21a中摘录的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也不熟悉。这部著作不仅提到了李嘉图著作的确切名称,而且还坚决地指出了它的巨大意义。<sup>④</sup>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当马克思写作A7的时候,B20已经产生了。在A7中,凡是涉及斯密的地方马克思都以B20为依据,这可以被那里所沿袭的一个错误

---

① 参见《格·荣克致马克思》(1844年7月31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436页,“我用十字信封把《文学报》第5、6、7期交给了邮局”;马克思特别提到了希策尔:《苏黎世通讯》,《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第11-15页;《本省通讯》,《文学总汇报》第6期(1844年5月),第20-38页。详情参见陶伯特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20-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及后续各页。

③ 参见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第1卷),巴黎:1840年,第6页:“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最完整、最夸张的表述——我们通常称之为绝对——存在于创造性的形而上学家李嘉图先生关于地租(Rent of Land)的著作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李嘉图在他的著作(地租)中……”

④ 参见约·拉·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Discours 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les objets particuliers, et l'importanc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吉·普雷沃译,1825年日内瓦—巴黎版,第80页,“正是李嘉图先生先驱性地深入到这门科学中,正是他纠正了最受人们尊重的权威所认可的那些错误,并清晰地确立了各种重要的、但直至那时仍被错误认识的多个原理。随着1817年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出版,一个科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新时代开启了”。注释:“<sup>2</sup>《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所证明。另外一个证据是，某些与 B20 中较长段落相关的页面说明同样出现在了 A7 中，马克思每次只是给出一个较短的段落。<sup>①</sup> 但是，个别并不包含在 B20 中的引文表明，马克思同样使用了斯密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 A7 中没有一条引文出自 MHB，这就可能意味着，或者是在完成整个笔记本 A7 之后，或者是完成了其中一部分之后，马克思才继续摘录斯密的著作。<sup>②</sup>

同 B20 一样，看起来 B19 至少 B19a 是在 A7 之前出现的。且不说马克思在 A7 中使用的所有出自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的段落都以相应的，也就是说以同样缩略的形式出现在 B19a 中（包括不正确的页码说明），根据这些摘录的特点（参见下文）可以设想，B19 至少 B19a 是在 B20 之前出现的。

笔记本 B24 同笔记本 B19 极为相似。在这两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用一条折痕把横向书写的页面分成两栏；在这两个笔记本中，只要马克思先保留右栏空白，那么他就用这一栏补充摘录；在这两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在页面中间（向左推移）最早摘录的著作标题上方写了一个罗马数字“Ⅰ”；而在其他被摘录的著作那里，他则总是在标题前面写上阿拉伯数字“2)”等等（这意味着，“Ⅰ.”有时是指笔记本，有时是指著作）。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这两个笔记本——它们在摘录特点、篇幅、风格、马克思的评注水平等方面同样极为相似——是在相同时间诞生的，即直接地前后相继诞生的。在 B24 中首先被摘录的不是李斯特的著作，而是许茨的著作，这一点足以反驳这样的设想，即 B24 是鉴于马克思在 1845 年初打算“批判李斯特”才出现的。反过来说，马克思在 B24d 中特别地写道，也就是说明显地注意到奥西安德从“分工”得出了“不同阶层的形成”<sup>③</sup>。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写的是“阶层”（Stände），而奥西安德写的是“社会阶级”（“Klassen der Gesellschaft”）<sup>④</sup>，这表明 B24 同 B19 一样出现得很早。看来，为了获取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知识，马克思最为详尽地摘录了萨伊的《论政治经济

① 参见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 18-19 页。

② 在马克思在 A7 第 XVI 页关于“地租”主题的文本中写到“一般的地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59 页] 之后，他在 MH 中继续对斯密进行摘录，这是可能的，因为 1) 在这一段之后他显然重新开始了一段；2) 他在这一段——其中包含三段关于斯密的并不存在于 B20 中的引文——中首次重新使用斯密的著作；3) 在接下来各页中（第 XVII-XVI 页），他用与此前并不一致的顺序为各栏起名；4) 在接下来各段中能够看出同 MH 中的斯密摘录的某些相似之处。

③ MEGA<sup>2</sup> 第 IV 部分第 2 卷，第 547 页。

④ 亨·弗·奥西安德：《论民族的商业交往》（Über den Handelsverkehr der Völker）（第 1 卷），斯图加特：1840 年，第 14 页。

学》(B19a);相反,对于许茨的篇幅浩大的著作,他只补充性地摘录了个别段落(B24a),这意味着B24是在B19之后产生的,至少是在B19a之后产生的。马克思根本没有对关于斯卡尔培克著作的摘录(B19b)进行编号,而他之后对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B19c)作的编号不是“3”,而是“2”,这就不难设想,他是直接地前后依次摘录上述两部著作的,但不是直接在B19a之后,而是在稍晚时候——大约在B24a-d之后——才摘录的。由此得出的设想——即马克思起初在B19a,之后还在B24a中使用的罗马数字编号后来过渡为阿拉伯数字编号——符合下面这一事实:在B20中,马克思在斯密著作的标题上方写的实际上不再是“I”,而是“1”。<sup>①</sup>但是,马克思最初确实给右栏预先规定了其他目的,这尤其有利于B19b并非直接出现在B19a之后这一设想;如果马克思在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后直接摘录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空白页上这样做。

右栏最初的用途可以从MHa中看出:在左栏,马克思主要以法文逐字摘录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在右栏,他把这些摘录——但应该强调的是,不只是这些摘录——改写为独立的德文文本。因此可以推测,MHa是在B19a之前诞生的。对色诺芬著作的摘录(B23a)可能出现得更早。这些摘录从内容上看首先涉及希腊先进国家的“国家宪法”,从形式上看则与在克罗茨纳赫作的摘录相同。<sup>②</sup>

马克思之后在B23中同样用罗马数字给各页编号,而且起初同样把它们分为三栏,这就引起了下面的设想,即他在A7之后首先摘录了李嘉图的著作,也就是说,B23或者至少到B23b是在B21之前产生的。这个设想似乎可以为下面的事实所支持,即在B21a-b中,李嘉图被多次提到过,同样穆勒也被提到过一次;相反,在B23b-c中,麦克库洛赫/普雷沃从未被提到过。<sup>③</sup>但是这个表象是具有迷惑性的:在B21a-b的三个相关的参阅说明中,两个需要追溯到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所写的内容,这二人确实对李嘉图和穆勒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三个参阅说明则要追溯到早在A7中根据比雷的著作所

<sup>①</sup> 马克思在B20第一页的上方写了两次“1”:一次是在右边三分之一处,一次是在最右边(=页数)。参见MEGA<sup>2</sup>第IV部分第2卷第333页的该页复制件。

<sup>②</sup> 参见MEGA<sup>2</sup>第IV部分第2卷第7、121、387页的复制件。

<sup>③</sup> 参见MEGA<sup>2</sup>第IV部分第2卷,第717页;之后,在B21a-b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说明……只是基于他对这位作者的著作的良好的认知”;相反,在B23中,马克思“从未提及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

引用的一段话。<sup>①</sup> 因此，所有这三个关于李嘉图的参阅说明都不是以对他的著作的某种认知为前提的，更不要说以“良好的认知”为前提了。相反，我们很难设想，如果马克思对这部著作本身已经具有了“良好的认知”，他还会如此详细地摘录普雷沃以穆勒为据所作的对李嘉图学说的阐述。但是，当他摘录这部著作时，他几乎没有理由再次回到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就此所写的内容。于是，所谓没有关于他们的说明的论据在B23b中同样被取消了。进一步讲，这个论据同样经不起更仔细的验证。事实上，B23b并不包含任何关于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的明确说明，但可能包含某种含蓄的说明：马克思在B23b中所作的评论——马尔萨斯“首先提出了……地租理论”，李嘉图/穆勒之后对之“加以完善”<sup>②</sup>——只能追溯到他们，<sup>③</sup> 尤其是它完全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熟知了马尔萨斯<sup>④</sup>在其中阐发上述理论的那部著作。<sup>⑤</sup>

① 关于李嘉图的第一个参阅说明（在B21a中），参见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75-476页，“李嘉图的基本原理：1）……2）……3）……（这些是麦克库洛赫根据李嘉图的思想总结的），第83-85页”；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第82页及以下几页。涉及李嘉图的内容是：“对他著作中采用的推理方式进行分析的最简要概括都可能会超出本书的界限。因此，我们会满足于就这部著作提供用这些概念所总结的结果。1. ……2. ……3. ……”第二个参阅说明（在B21a中）参见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76-477页，“麦克库洛赫……把厚颜无耻、培根关于哲学的下述立场运用于国民经济学；……因此，在李嘉图对马尔萨斯和穆勒的谎言早已熟知之后，麦克库洛赫在1823或1824年讲了这些话”。马克思这里所谓的“谎言”是指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设想，马克思是特别联系人口有超过维持他们的生存资料的趋势这一学说的。且不说马克思早已熟知这一被恩格斯在《大纲》中尖锐批判的学说，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就对之做了详细的研究。参见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第70页及后续几页；普雷沃：《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同上书，第160-161页，第189页及后续几页。此外，如果同时假设马克思对穆勒的著作尚不具有“良好的认知”——虽然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看出为何这个参阅说明应该意味着对李嘉图的著作有“良好的认知”。参见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717页。关于第三个参阅说明（在B21b中）参见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80页：“普雷沃赞颂李嘉图主义者，这些资深的经济学家把知识还原为巨大的简单性，他们以中位数作为基础，并且不考虑所有可能阻止他们进行归纳的偶发情况（正如伟大的李嘉图不考虑在一国居住的人口数量）”；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6页，注释1；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63页。关于对平均计算的批判，参见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苏黎世—温特图尔：1843年，第65页；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46-47页。

② 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01页。

③ 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第79-80、82页；普雷沃：《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同上书，第157-158、172页。马克思在B21中摘录了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1）地租不会影响价格。生产费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第157页。这一原则是马尔萨斯最早确立的，前引著作。”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77页。就其他在考虑范围之内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而言，毋宁说，他们强调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马尔萨斯地租理论的对立，而没有提及依赖性本身。

④ 托·罗·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以及调节它的原则》（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伦敦：1815年。

⑤ 诞生于1858年及其后几年的《大纲》的《笔记本Ⅶ》的摘录部分才包含对这部著作的摘录，马克思恩格斯遗产，B 91 A [A 40]，第246-251页，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此外还有一个证据：恩格斯摘要（B21c）早在 B23b 之前就出现了。在关于《大纲》的摘要中，马克思把恩格斯在那里阐述的对实际价值理论的批判缩略为一个简明的表达形式，这一表达形式同样出现在 B23b 中。<sup>①</sup>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一个批判性评论。<sup>②</sup> 在 B23c 中包含的对德斯杜特·德·杜拉西的一段话的参阅说明——它同样存在于 B21d 中<sup>③</sup>——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B23c 是在 B21d 后产生的。但是，没有情况表明 B23c 并不是紧接着 B23b 出现的；相反，自从阅读了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尤其是普雷沃的附录后，马克思便把穆勒视为李嘉图的学生，以至于从此以后他经常同时提到这两个人<sup>④</sup>。因此倒不

---

①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0-451页，“这样，英国人……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如果我们转向萨伊的学说，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抽象。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惟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但是，只要容许有竞争关系，生产费用也就随之产生”。马克思在 B21c 中写道：“在英国人那里，同生产费用相对，竞争表现效用，在萨伊那里，竞争则表现生产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在 B23b 中，马克思写道：“相反，萨伊使有用性有效。对他来说，这种有用性通过消费者的需求，因而通过消费者的竞争表现出来。生产费用通过扩大供给量表现出来。在价值的规定中，李嘉图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则只抓住有用性/效用。在萨伊那里，竞争表现生产费用。”MEGA<sup>2</sup> 第IV部分第2卷，第392页。马克思在这里联系到萨伊对李嘉图的一段话——应该强调的是，这段话是关于交换价值的——的注释。萨伊指出，“如果是物品中的固定劳动量决定它的交换价值，那么在我看来，李嘉图先生的错误在于他只考虑到物品的价值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为生产出这些物品而必须做出的大量牺牲。他忽略了价值的真正依据——效用这一首要因素。正是效用引起了人们制造某件物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生产任意一件物品所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换句话说，生产费用导致了它的稀缺性，限制了这一物品被用于交换的数量。当物品的需求增长、供给减少时，它的价值升高；当物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时，它的价值降低。这个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第2版第1卷），附让-巴·萨伊的解释性和批判性注释，F. S. 康斯坦西奥译，巴黎：1835年，第8页及后续几页。

② 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4-455页。“当人们假定需求的减少马上影响地租并立刻使相应数量的最坏耕地停止耕种的时候，（李嘉图的地租）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义是有缺陷的……托·佩·汤普森上校在反对这个定义时，又把亚当·斯密的定义搬了出来……但是，这个解释没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别，正如上述的定义忽略了竞争一样。”马克思在 B21c 中写道：“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假定，需求的减少马上影响地租并立刻使相应数量 [!] 的最坏耕地停止耕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而斯密的定义不包括肥沃程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页（部分内容根据《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的译文作了改动——译者注）。马克思在 B23b 中写道：“因此，他（李嘉图）认为，较好耕地马上使较差耕地停止耕种。他忘记了竞争。”参见 MEGA<sup>2</sup> 第IV部分第2卷，第402页。

③ MEGA<sup>2</sup> 第IV部分第2卷，第489、453页。

④ 马克思在 B21c 中这样写道：“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则认为是生产费用”，而恩格斯则写道：“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就坚持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0页。

如假定，在做完 B21 中的摘录之后，马克思在 B23 中直接依次摘录了他们。

在 A8、A9 中，穆勒只被——不是按照摘录，而是按照著作——逐字引用了一次，李嘉图则从未被逐字引用过，这种情况似乎表明，马克思是在后来，也就是在 A9 之后才摘录了他们的著作的。与此相符的是，韦伯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马克思以前使用过的几部著作，却没有提到这些著作。<sup>①</sup> 但是，且不说韦伯本人是否读过这些著作还是个问题，它们自身也不太适用于新闻报道。此外，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这两位作者的突出特征就在于 B23 中详细阐述的他们的“冷酷无情”<sup>②</sup>——很快就在他自己的只是顺便涉及英国国民经济学的第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冷酷无情的李嘉图”<sup>③</sup>。但是就缺乏引文而言，是否要按照 A9 的特点（参见下文）在那里期待这些引文似乎是成问题的。无论如何，引文数并不能说明问题；马克思在 A9 中如此频繁地谈及两位作者看起来更重要。<sup>④</sup> A9 中的一系列参阅说明都不利于这样的设想，即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认识只是来自麦克库洛赫/普雷沃；<sup>⑤</sup> 完全相反，这些参阅说明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早已更为详尽地熟悉了他们的著作。应该强调的是，他不仅熟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而且同样熟悉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sup>⑥</sup> 的确，就 A9 中包含的关于穆勒的或明确或含蓄的说明而言，相关的段落也同样包含在 B23c、B21e 中，由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摘录早就存在。但是马克思没有从摘录而是从著作本身中逐字摘引出唯一一段引文，并不说明太多问题。除了 B20 之外，他在 A7 中同样引用了斯密的著作。

没有比 B24e、B25、B26 这一排序更准确的了。对李嘉图著作所作的关于纸币的补充摘录（B24e）只能让我们断定，它是在 B23c 之后产生的。尽管马克思在 B23b 中只记下了《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货币”章中的几句话，但他在 B23c 中却详细地摘录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相应章节。这些章节激发他在那里首次写下了较长的离题阐述（Exkurs）。从笔记本 B25 只能断定，它是在 A7 之后产生的。尽管马克思在 A7 前两栏中写下的来自比雷著作的引文几乎全部源于导言，但是他之后在 B25 中只摘录了导言中的三句话。马克思从 A7 起多次引用在 B25 中摘录的第一卷，并不意味着

① 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 26 - 27 页。

② MEGA<sup>2</sup> 第 IV 部分第 2 卷，第 421、423、462 页。

③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79 页。

④ 马克思在 A9 中提到的名字如下：斯密 8 次，李嘉图 7 次，穆勒 6 次，萨伊 6 次，其他经济学家 1 到 2 次。

⑤ 参见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 27 页。

⑥ 尤其参见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45 - 346、351 - 352、355 - 357 页。

B25 是在 A7 之后马上产生的。马克思同样能够很好地使用他本人已经拥有的该部著作。<sup>①</sup> 从他在一本早期的布鲁塞尔笔记中按照另外一个版本继续进行摘录<sup>②</sup>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在他必须暂时留下他的书籍、离开巴黎之前不久，他才开始摘录这部资料丰富的著作。笔记本 B26——至少它的第一部分——同样可能是在巴黎的最后几周诞生的。《神圣家族》的手稿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设想，马克思在这里是横向，也就是正常地书写每一页的，没有把它们划分为几栏。他之后也是这样开始摘录 B26 的。但是，看来每行太长使他感到不舒服，于是他在 B26d 中又返回到在 MH、B19、B24 中所使用的形式，即重新用折痕把横向书写的页面分成两栏；此后，他在 B26c 中继续使用相同的形式。<sup>③</sup> B26 的第二部分可能是在布鲁塞尔才诞生的，那时马克思已经普遍地使用这种形式了。

## 六

根据目前所作的阐述，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重建上述笔记本所记录的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但是，马克思从何时开始从事这些研究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本人在 1859 年所作的叙述表明，在 1843 年着手开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当他认识到政治的、法的关系由市民社会决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之后，他便直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sup>④</sup> 但是，看来他在这里只是事后用一般的线条勾勒了他的思想传记。现在通常这样认为，马克思为了写作 1844 年春计划的“国民公会

---

① 参见《在巴黎开始作的笔记中的书目》，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全宗第 1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132 号。

② 《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布鲁塞尔：1843 年，第 429—694 页；马克思恩格斯遗产，B31 [B28]。

③ 在进展到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结尾时，马克思在第 17 页下部三分之一处（第 9 纸面右页）暂时中断了对布阿吉贝尔的《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的摘录。他把这一纸面的背面（第 9 纸面左页）空了出来，并在接下来的一页摘录罗的《论货币和贸易》。此后，当他继续摘录布阿吉贝尔的《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时，情况表明，被空出的那一页（第 9 纸面左页）并不够用，因此他后来不得不插进了半个印张（第 10 纸面）。在他暂时用阿拉伯数字“1)”、“2)”、“3)”给被摘录的布阿吉贝尔的著作依次编号之后，他又再次给 B26 中摘录的第二位作者，即罗加上了数字 2)。在这里，他对划分体系做了这样的改变：他给被摘录的作者加上了阿拉伯数字。与之相反，他给各部著作加上了小写字母“a)”、“b)”、“c)”；在布阿吉贝尔这里，他事后把这些字母写在了已有的数字上面。对于他在第 20 页（第 10 纸面左页）只写下标题的布阿吉贝尔的第四部著作，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给它写下了字母“d)”。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12 页。

史”而作了勒瓦瑟尔摘录 (MHa), 也就是说, 他最早在五月, 或许在六月, 也可能在七月初才着手从事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sup>①</sup> 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写作国民公会史的计划同样源于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而进行的研究, 所以 MHa 同样可能在这个计划之前产生。它符合这样的想象: 马克思坚定地行进在他总有一天——或许不是马上——会踏上的通过“解剖学”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那条道路上。

虽然在《德法年鉴》中发表的两篇文章让我们认识到, 马克思的注意力日益投向经济学问题, 但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着手开展上述研究。不管怎样,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在这段话中, 马克思把落后的德国人——他们才在“国民经济学”的形式下开始对“现代主要问题之一”, 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产生兴趣——同先进的民族相对照。在这些民族那里, 这个问题已经是“政治经济学”, 即“社会对财富的统治”<sup>②</sup>。撇开对李斯特——马克思对他的学说很熟悉——的参阅说明不谈, 这段话可能是以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的“绪论”为基础的,<sup>③</sup> 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阅读了这部著作的开头几页。<sup>④</sup> 顺便说一句, 萨伊在“绪论”中通过参阅色诺芬的《经济论》来说明“在古代民族那里”经济学观点的界限。<sup>⑤</sup> 因此可以设想, 对色诺芬 (B23a)、勒瓦瑟尔 (MHa)、萨伊 (B19a)、许茨 (B24a)、李斯特 (B24b)、奥西安德 (B24c-d) 的摘录是在 1844 年初着手加工整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诞生的, 也就是说, 是在马克思决定利用逗留巴黎的时间写作一部关于国民公会的著作之前诞生的。<sup>⑥</sup> 这一设想为笔记本 B19、B24 的布局所支持, 它完全符合在《导言》中提到的评论。马克思可能在此后——最早在

① 参见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 第 18 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204 页。

③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 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第 3 版第 1 卷), 巴黎: 1817 年, 第Ⅶ-LXXIX 页。

④ 与此相符的是,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的评论中指出:“1843 年, 他(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11 页。

⑤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 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第 3 版第 1 卷), 巴黎: 1817 年, 第 XXⅦ 页及后续几页。

⑥ 这符合恩格斯在《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中关于马克思的那篇文章的表述:“1843 年秋, 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 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之所以停刊, 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 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2 卷),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第 393 页。



五月——再次转向了政治经济学。

考虑到萨伊——尤其在法国——被赋予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马克思首先转向他看来并不令人惊讶。在马克思当时所认识的作家中，蒲鲁东尤其强调萨伊的重要性。<sup>①</sup>大段的多半逐字抄写的法文摘录的特点表明，对于目前对经济学知之尚少的马克思而言，<sup>②</sup>首要的事情是获得基本的知识。在他先把《论政治经济学》连贯地摘录到第三篇三分之二处以后，他依据萨伊的建议<sup>③</sup>按照主题顺序摘录了附录。他暂时把笔记本(B19)的右栏留白，看来是要用于自己的阐述。之后，他开始写一个新笔记本(B24)。在这个笔记本中，他首先在双栏中摘录了1843年秋出版的许茨的著作；在第二部分中，他以并列的方式在左栏摘录了李斯特的著作，在右栏摘录了奥西安德对李斯特著作的批判；最后在第三部分中，他摘录了奥西安德的《论民族的商业交往》的前三章。

看起来，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在这最初阶段不仅服务于获得他尚不具备的一般知识，而且同样服务于在《导言》中宣称的“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虽然它“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sup>④</sup>。前面提到的B24d中的笔记——对于奥西安德(!)来说，“不同阶层的形成”是“分工的结果”——表明，马克思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要在政治经济学中“解剖”市民社会。<sup>⑤</sup>可能是在后来，也就是当他重新着手进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他才在B19的右栏写下了对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理论》的摘录，之后又写下了对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的摘录。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在该书导言中，萨伊没有谈论“解剖学”，而是表达了相关的思想<sup>⑥</sup>——并不太感兴趣，他仅仅在抄录了导言第一部分的几

---

① 参见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巴黎：1840年，在该书中，萨伊被称为“(经济学家)宗派的泰斗”(第69页)、“经济学家的族长”(第104页)、“经济学方面的赫米斯”(第110页)等。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③ 参见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2卷)，巴黎：1817年，第419页：“为了方便读者连续和系统地研究概要，这里给出读者所应阅读的文章顺序。”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2-203页。

⑤ MEGA<sup>2</sup>第IV部分第2卷，第547页。

⑥ 参见让·巴·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1836年布鲁塞尔第3版，第5页：“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别无二致。政治社会——我们称之为国家——与人体一样是生命机体。它们仅仅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运动而存在并生存，正如个人的机体仅仅是通过它的器官的运动而存在一样。我们对人体的本性和功能所作的研究创造出一组概念、一门科学，我们将其命名为生理学。我们对社会机体不同组成部分的本质和功能的研究同样创造出一组概念、一门科学，我们将其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或许称为社会经济学更好。”

个短句之后便把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丢到了一边。直到他在一个新笔记本（B20）中摘录斯密那部名著的法文版时，他看来才逐渐明白了上述的见解。尽管到此时为止马克思通常都是用法语逐字摘录法文著作，但是在 B20 中他的摘录自由了很多，他不仅把大部分引文直接译为德文，而且概括地意译整段的内容。他首先用这种方式连贯地摘录到第二篇的三分之一处（在第二卷中）；在那里他中断了下来，以便回到第一篇（在第一卷中）再次最深入地摘录关于三种收入类型的章节；当他之后再次进展到第二篇（在第二卷中）——不过这一次进展到该篇结尾——以后，他又中断了摘录；他再次回到第一篇（在第一卷中），又摘录了斯密探讨影响收入的情况的那一章节中的一个段落。这些摘录是 B20 中最后的摘录，它们后面还有一页是空白的。

B20 中出现的情况表明，当马克思仔细钻研《国富论》的时候，他发现了之前不曾知道的内容，即三种收入类型被赋予了根本的意义。<sup>①</sup> 看来，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用早在 B19a 中实践过的按照主题整理材料的方式来认识三种收入类型中的每一种收入本身，并且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记本 A7 诞生了。

不仅相对的页面没有显现出任何痕迹，而且各栏交替的标题也让我们认识到，在书写 A7 的每一页之前，马克思都对它们作了相应的划分。阿多拉茨基的设想——各栏表明马克思打算对三个主题中的每一个都作差不多相同篇幅的阐述<sup>②</sup>——是没有根据的。毋宁说，编了页码的页面的特殊次序（参见附录）表明，马克思起初并没有做太多打算，他甚至没有考虑要制作一个笔记本。总的来说，当他把几个横向折叠的印张交错地放在一起做成他的笔记本时，“笔记本” A7 就成了一个自发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拿了一个印张，将它横向折叠。然后，他不是先写“左”纸面的外页，再写“左”纸面的里页，<sup>③</sup> 而是先写两个外页，然后再写“右”纸面的里页。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一个印张不够用。他不是先写完仍然空白的“左”纸面的里页，而是取了一个新印张，他先写了一个纸面，即“右”纸面的外页，然后写了它的里页。之后，他用相同的方式写满了第三个印张的两个“右”页。当他写到这两页中的第二页（第Ⅶ页）时，他看来认为纸够用了；不管怎样，他在仍然空白的第二栏中完成了第一栏的文本。但是当他写另外两栏时，他必定发觉自己弄错了，结果他又拿来了第四个印张。在这一印张上，他又先写了“右”纸面的外页，然后写了它的里页。看来他现在认为，目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2 章。

② MEGA<sup>1</sup> 第 I 部分第 3 卷，第 38 页。

③ “左”、“右”的称谓涉及图示，参见本文附录。



前保持空白的“左”页对于写完文本来说足够用了：无论如何，他从现在开始转而书写这些页面——先是第四印张的左页，然后是第三印张的左页，等等，直到他写到第Ⅰ页的背面，即第ⅩⅥ页。

现在，马克思可能先是在一个以前做好的笔记本（MH）中继续进行对斯密的摘录。之后，他为这些摘录激发而继续写作关于“地租”主题的文本。对此，第ⅩⅥ页第一栏留下的地方并不够用。于是，他拿起了第五个印张。他先写了这一印张“左”纸面的里页，又写了“右”纸面的里页，然后写了“右”纸面的外页。此后，他又拿了第六个印张，最后还拿了三个印张。他分别写满了这些印张的两个“右”页——直至第ⅩⅦ页。在那里，他在第一栏（上部三分之一处）中断了写作。事后，他才把九个印张缝成一个笔记本。因此，其中的前几页是空白的。第三页的书目可能是1850年他在伦敦时才编制的，那时他决定“再从头开始”<sup>①</sup>。同样，可能在那时他才在第一页上写下了“笔记本Ⅰ”。

这个笔记本的诞生过程已经表明，马克思并不是分别一气呵成地写下关于三种收入类型的文本的。拉宾对此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起点”不是工资，而是资本的利润。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第一阶段（至第Ⅶ页）先写满了第二栏，又写满了第三栏（至第Ⅵ页），然后写满了第一栏，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资本视为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sup>②</sup>。但是，撇开这一点可能根本不具有拉宾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不谈，它是完全不清楚的。就这一阶段来说，我们只能确定：马克思在第Ⅰ页是先写满第二栏后写满第三栏的；另外，最晚在第Ⅵ页，马克思是先写满第一栏后写满第二栏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书写超过了确定一栏右边界的竖线。之后，他在这条竖线的右边又画了一条新的竖线。<sup>③</sup> 马克思是否在前几页——大概在第Ⅳ页之前——先写满第二栏后写满第一栏，这是不能确定的。<sup>④</sup>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② 参见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239页。

③ 参见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38页的第Ⅰ页复制件。

④ 马克思在第Ⅳ页第二栏的“in vollständiger Proportion. ibid”（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55页37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1—242页，“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之后暂时中断了写作；在它的下面，马克思画了一条横线，但是在它上面，马克思很快就把下一个句子删掉了。根据字形，马克思可能暂时在“（z. B. Papiergeld）steigen.”（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55页40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之后中断了第二栏的文本，可能（还）在第Ⅴ页的“p. 163—65. Smith”（MEGA<sup>1</sup>第Ⅰ部分第3卷，第56页37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之后再次中断了文本。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栏中（至第Ⅶ页）自由地写下了关于“工资”主题的文本，但是——看来还不确定——他却从他或者逐字抄录或者自由写下的主要来自 B20、一小部分来自 B19a 的引文中合成了他——跳过第Ⅶ页——在另外两栏（起初至第Ⅺ页或第Ⅹ页）写下的文本。接下来，他在前两栏中（至第ⅩV页或ⅩⅢ页）可能直接地依次写下了对舒尔茨、贝魁尔、劳顿、比雷的著作的摘录。当他在第二栏（至第ⅩⅥ页）中又补充了另外几个或来自 B20、或来自舒尔茨著作的引文之后，他现在开始自由地继续（起初至第ⅩⅥ页，之后至第ⅩⅪ页）关于“地租”主题的文本。此后，马克思终于（从第ⅩⅢ页起）在所有三栏中——但他继续以通常的方式给它们起了标题——连续地写下了关于“异化劳动”的文本。

如果马克思不是从一开始，那么至少是在读了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之后就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即使以其“先进的”形式——能够在实际中解决“社会对财富的统治”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是直到通过阅读斯密的《国富论》，甚至可能通过他在 A7 中所获得的概括认识，他似乎才确信，国民经济学不仅“表达了异化劳动的规律”，而且用“它自己的话”证明，“私有财产的物质过程”本身使扬弃私有财产日益成为普遍的、不容拒绝的需要。<sup>①</sup> 可能是考虑到他的研究现在不断深入，马克思阅读了下列作者的一系列新著，例如被莫·赫斯（M. Heß）称为圣西门“最优秀的学生”<sup>②</sup> 之一的米·舍伐利埃（M. Chevalier）<sup>③</sup>、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sup>④</sup>——可能是舍伐利埃使马克思的兴趣转向了他<sup>⑤</sup>、加尼耳（Ch. Ganih）<sup>⑥</sup>——马克思可能通过阅读西斯蒙第的著作注意到了他<sup>⑦</sup>。马克思摘录了列在许茨书目第一位的包含普雷沃附录（B21b）的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B21a）、麦克库洛赫特别提到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著作（B21d）<sup>⑧</sup>、李嘉图的《政治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及后续几页。

② 参见莫·赫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格·海尔维格（G. Herwegh）主编，第1部分，苏黎世—温特图尔：1843年，第74—97页；莫·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著作文选：1837—1850年》（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Eine Auswahl），奥·科尔纽和沃·明克（W. Mönke）主编，柏林：1961年，第201页。

③ 米·舍伐利埃：《法兰西学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fait au Collège de France）（1841—1842年），巴黎：1842年；（1842—1843年），巴黎：1844年。

④ 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第2版），巴黎：1827年。

⑤ 参见舍伐利埃：《法兰西学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卷），巴黎：1842年，第125页及后续几页。

⑥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巴黎：1809年。

⑦ 参见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巴黎：1827年，第53页。

⑧ 参见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第146—147页。

学和赋税原理》(B23b)、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B23c, B21e)。在最初的几个笔记本(B19, B24, B20, MH)中,马克思只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用自己的话表述他所摘录的内容。相反,在这两个新笔记本(B21, B23)中,引人注意的是他对摘录的评注越来越多。在那里,他的评注的篇幅——起初只有几句话,之后就是整段,再往后便是整页——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不断扩大,直至这种比例关系最终在B23的最后三分之一处发生了颠倒,结果不再是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断了他的摘录,而是这些摘录中断了他的文本。另外,在B23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用罗马数字——同A7一样——给这个笔记本编了页码。因为,如果这一假设——在A7之后首先出现了B21a-d、然后才出现了B23b-c——符合实际的话,那么马克思在B23中纯粹机械地保留了A7的形式就不易解释了。<sup>①</sup>毋宁说,它可能表明,考虑到他对该笔记本中摘录的作者所赋予的完全独特的意义,马克思用这种方式使它——同A7一样——从他通常的笔记本中凸显了出来。<sup>②</sup>

按照流行的观点,马克思此时——最晚在1844年7月——已经写了我们谈过的、“序言”涉及的那部著作;在这个43页的笔记本中,只有最后4页(A8)保留了下来,39页佚失了。弗·康·布鲁什林斯基(В. К. Брушлинский)认为,“这是尤其令人恼火的,因为这份第二手稿是根本性的手稿”,确实,“我们能够假设整部作品的标题就写在第二手稿佚失的第一页上”<sup>③</sup>。然而,这里出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很难想象那份主要文本所佚失的39页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不管怎样,从A9可以看出这39页不会包含的内容(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对黑格尔的批判)。依据这一点,再依据保留下来的那4页,最后依据A9中对前面各页的间接说明,我们可以判定,马克思在这个文本中可能专门探讨了国民经济学问题。于是,惹人注意的是,在保留下来的最后部分中阐发的偏偏是其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在A7中找到的思想。

第二,由于马克思如此细心地把当时写下的几乎所有东西都保留了下来,因此,如果在他的笔记本中偏偏“主要文本”——A7之于它只是准备材料,A9之于它只是补充——佚失了,即便不是全部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佚失了,也让人感到惊讶。

① 相对页面的痕迹表明,马克思是在后来才给第I页编上页码的。

② B23b的前两页分为三栏同样可以说明,马克思起初是有意识地以A7的形式为出发点的。

③ 弗·布鲁什林斯基:《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史和出版史评注》(“Note sur l'histoire de la rédaction et de la publication des ‘Manuscripts économique-philosophiques’ de Karl Marx”),《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第19期,第74页。

第三，我们对马克思当时所怀揣的计划的了解首先来自马克思本人的通信——但其中只谈到对鲍威尔发动新的进攻（参见下文），其次来自卢格的书信。虽然马克思早在三月就同卢格断绝了个人联系，<sup>①</sup>但是 A9 表明，卢格的说明——关于“国民公会史”，关于可以证明的马克思为此所阅读的书籍量，关于“对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撇开卢格当时同马克思居住在同一栋房子——田鳧路 38 号——不谈，他可以通过共同的熟人获悉马克思的计划。<sup>②</sup>马克思对这些熟人谈过各种各样的计划，但是如果他没有谈过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已有很大进展的计划，同样会令人惊讶。

第四，就连恩格斯在那之后——看来马克思在巴黎给他看了自己的笔记本——起初也只是写到“你所收集的材料”<sup>③</sup>。

第五，如果前面的 39 页在风格上与保存下来的 4 页相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情况并非如此），那么马克思在再次浏览笔记时只在 43 页中的两页上发现了三处有待补充的地方，就显得很奇怪了。

由于这个本身可疑的假设，即 A8、A9 中包含的 B23b-c 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少，是因为马克思在 A9 之后才写了 B23b-c，至少是 B23c<sup>④</sup>，最先提到的困难就变得更大了。不管怎样，与之相反的假设——B23b-c 被 A8 佚失的那些页面所利用——考虑到了这个困难，但只考虑到了这个困难。<sup>⑤</sup>对相关各页的比较引出了第三个更为简单的假设，它不仅考虑到前面提到的所有五个问题，而且还能够进一步解释为何 A8、A9 中有关 B23 的内容如此之少。这个假设就是，A8 的四页——从外表上看，它们同 B23c 的最后几页异乎寻常地相似——是马克思在 B23c 中所写文本的结尾。

B23c 最后一页（第 XXXIII 页）的字形并不能表明马克思在这里中断了他的离题阐述。同样，这种阐述的继续从内容上看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当马克思在 B23c 的最后几句话中再次返回到“私有制前提下的”劳动之后，<sup>⑥</sup>根据 A9 中的补充，他在第

① 参见《卢格致他的母亲》（1844 年 5 月 19 日），《1825—1880 年阿尔诺德·卢格的书信与日记》，第 349—351 页。

② 陶伯特也持同样看法，参见《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 18 页。

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 年 10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22 页。

④ 参见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间的问题与疑问》，第 27—28 页。

⑤ 例如，布鲁什林斯基这样认为：“由于这些笔记的内容没有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因此我们能够假定，它恰恰被用于 1844 年第二手稿的未保存下来的部分中”。马克思：《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Заметки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Джемса Милля），《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66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⑥ MEGA<sup>2</sup> 第 IV 部分第 2 卷，第 466 页。

XXXVI 页从客体方面研究了私有财产；<sup>①</sup> 在第 XXXX 页研究了无财产的大众同财产的对立，另外还研究了自我异化的道路；<sup>②</sup> 在第 XXXX 页即 A8 的第一页研究了自我异化最后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一样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它只是一件商品，等等。<sup>③</sup> 有足够多的例子表明，马克思并不认为仅仅因为一个笔记本写满了就有理由中断写作；在必要的情况下他用各种方法帮助自己。例如就 B23 的继续来说，我们可以想象：马克思首先按照他此前已经多次采用的做法<sup>④</sup>取来一个印张，他写了它的“右”纸面的两页（第 XXXIV-XXXV 页），而左纸面执行了扉页的功能。<sup>⑤</sup> 然后，他按照在 B25 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松散地附上另外两个印张（第 XXXVI-XXXX，XXXX-XLIII 页=A8）。与之相符，在 A8 中，第 XXX-XLI 页、第 XLII-XLIII 页分别是同一纸面的两页，而在一个从第一页（也可能是第三页）起正常编页的笔记本那里，第 I-II 页等，第 XXXX-XXXX 页等会分别是同一纸面的两页。<sup>⑥</sup> 于是，损失可以减少到篇幅为 6 页的文本或者 4 个纸面：佚失的可能是 B23 的两个（新的）外侧纸面，以及那两个松散附上的印张中的一个印张，即 A9 中的补充所涉及的那一印张。

如果这两个纸面（A8）属于 B23 的假想合乎实际，那么马克思从现在起就在 B21 中继续做穆勒摘录。<sup>⑦</sup> 然后，他在这个笔记本的封皮上——跳过恩格斯——一口气写下了其中摘录的著作的作者（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穆勒），后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89 页。

②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94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81 页。

④ 参见 MEGA<sup>2</sup> 第 IV 部分第 2 卷，第 628、692 页。

⑤ 1850 年，马克思把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摘录的国民经济学著作一部分写在 A7 的第 3 页上，一部分写在他当时为两组五本或者两本笔记所做的两个封皮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遗产，B22 [B24]，B35 [B35]。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B23 并没有这样的封皮，虽然其中摘录的著作同样没有出现在 A7 第 3 页的书目中。不过，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B19。

⑥ 这个同样有利于格·巴加图利亚的假说——它只为薄弱的内容上的论据所支撑——的论据为人们所列举，即 A8 是 A7 的继续，因为 A7 的最后一页是第 XXVIII 页，参见巴加图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开始形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法论特点》。巴加图利亚的出发点同样是，至少 B23c 是在 A9 之后才出现的。不管怎样，他试图通过他的假说来解决由独立的“第二手稿”的假想所导致的上述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然而，这个假说又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由于马克思多次跳过了一些页码或者把一些页码使用了两次（参见 A9、B23），这样一种错误同样可能发生在“第二手稿”中。但是显然，错误的可能性——如果它已经被认可——同样可以被用于简化上面的有根据的假设。

⑦ 马克思是分三个阶段进行摘录的。当他在 B21 第 13 页底部摘录到穆勒著作的第 255 页之后，他还在该笔记本第 14 页上抄录了第 13 页中的一句话。他没有理会竖线，而是连贯地从这一页的左边至右边写下了这句话。之后，他在这句话的下方——同样从这一页的左边到右边——画了一条线。可能在停顿一阵后，他才在这条线的下面——各栏现在再次依次写满——继续进行摘录，先摘录至该书的 271 页，然后又摘录至 273 页。



来他又补充了“5) 西斯蒙第,《说明》等”<sup>①</sup>,这表明他同样打算摘录以这一标题出版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附录中的、反对生产的提高总是好事这一流行学说的那几篇文章。<sup>②</sup>马克思在7月底反对卢格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麦克库洛赫是“冷酷无情的李嘉图的学生”的观点,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它是针对“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即麦克库洛赫的。这意味着,马克思此时已经读过《说明》。<sup>③</sup>马克思没有抄录《说明》中的任何内容,确切地说,他后来划掉了封皮上的那一标题,这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是在阅读之前在封皮上写下标题的。这将是一个新的证据,它证明 B21——包括穆勒摘录——早在7月底就存在了,也就是说,B23c、B21e 早在 A9 之前就产生了。

在写完了中断他的研究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后,马克思看来再次浏览了他的最后几个笔记本。由此,他认为有必要作上述的补充,于是 A9 诞生了。虽然这次他从一开始就这样书写各个印张的纸面,从而当他把它们合并成一个笔记本时就出现了正常的页面次序,但是被缝进来的黑格尔摘要(A9\*)表明,马克思是事后才把它们缝合起来的。不过,文本的结构更清楚地表明,A9 并不是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又同 A7 一样是一个自发过程的结果;马克思不假思索地写下了掠过他头脑的所有想法,这说明他在这里几乎没有考虑摘录。前两个补充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最初的计划是相当谦逊的:第一个补充只写满了一个纸面的两页,第二个补充只勉强写满了半栏。但是,在第Ⅲ页开始的第三个补充却根本看不到终点。它不断泛滥蔓延,马克思便把它分解为几个后来轮流继续探讨的关于不同主题的离题阐述。起初插入一句话中间的编号“(1)”、“(2)”等等越来越失去其意义,结果马克思在把它坚持到“(7)”之后便弃之不用了。

尽管前两个补充保持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范围内,但是第三个补充起初——从(1)到(5)——涉及马克思迄今为止几乎从未谈论过的一个主题:自我异化在共产主义中的扬弃。简略地说,马克思把他的观点同迄今为止描绘扬弃自我异化之“道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区分开来。但是,他在(6)中却突然转而阐释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反对肇始于鲍威尔的“新批判运动”。这一转向并非源于他先前所写的内

① 参见 MEGA<sup>2</sup>第Ⅳ部分第2卷第471页的封皮页复制件。

② 西蒙德·德·西斯蒙第:《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79-531页。

③ 同上书,第481-500页,“第一篇论文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驳〈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探讨”。



容，而是为外在的动力所决定的。从燕妮·马克思在1844年6月21日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出，早在6月中旬马克思就考虑再次向鲍威尔发起攻击。<sup>①</sup>但是，看来他当时对这件事情还不太确定。当赫斯——马克思给他写信谈了自己的打算——在7月3日的信中劝阻他时，<sup>②</sup>荣克——马克思不久之后便同样向他批判地评论了鲍威尔——则在7月31日的信中认为，如果马克思为“某一份德国报纸写下”他的批判，将是件好事。<sup>③</sup>看来，这封信连同荣克当时寄给马克思的最新几期《文学总汇报》持续强化了马克思的这一打算。无论如何，A9中以一句“也许这里是合适的地方”开始的那段话是他实施这一打算的第一个明确起点。马克思当时也让费尔巴哈知晓了这个打算，以便“事先”获悉他的意见。<sup>④</sup>虽然从开头几句话本身可以得出马克思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不过直到那时他也只是想想而已。而这段话却表明，在计划向鲍威尔重新发动进攻时对马克思而言什么是尤为重要的。在这段话之后，马克思还有三次返回到国民经济学、共产主义等等，第一次是直接在接下来的（7）中，第二次从第XVIII页起，第三次从第XXXIV页起。但是显然，从现在起马克思需要首先批判黑格尔，这一批判占据了A9后半部分的大部分篇幅。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之后，是在阅读了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之后才能够进行他的黑格尔批判的。也就是说，他以在A9中实现的那种形式所进行的黑格尔批判并不是那些研究的起点，而是那些研究的结果。这有利于下面的假设，即始于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之所以中断，不仅要归因于阐述的问题，而且要——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内容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马克思在做完那些研究之后才感到有能力对黑格尔辩证法作适当的批判，并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是计划中的再次对鲍威尔发动进攻的核心问题，那么就可以假设，至少A7早在6月中旬，也就是在燕妮·马克思启程前往特里尔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

---

① 参见《燕妮致马克思》（1844年6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4页。

② 《赫斯致马克思》（1844年7月3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434-435页。看来，马克思误以为鲍威尔还没有对他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做出反应。在探讨这件事时，赫斯写道：“您没有认识到，如果鲍威尔不为自己辩护，他将被您的批判所毁灭。对他来说，辩护只有一种——公开承认他迄今为止的错误。这证明您是多么的谦虚。当然，我们根本不指望他这样做。但是，他同费尔巴哈一道用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做了。现在，情况对他来说更糟糕了！”

③ 《荣克致马克思》（1844年7月31日），MEGA<sup>2</sup>第Ⅲ部分第1卷，第436页。

④ 《马克思致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意味着马克思在5月底再次着手进行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提到的“小册子”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同A9中包含的“序言”的计划相符合。这份“序言”——马克思在其中再次提到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案——表明，从现在起，这部计划中的著作（尽管马克思谈到了“本著作”，但这看来是一种抢先行动）首先包含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撇开它是实现上述方案的第一步这个间接说明不谈，关于它的意图马克思几乎没讲什么。马克思直接探讨计划中的著作的这个方面的唯一一句话，涉及他在原则上不打算触碰的东西。<sup>①</sup>与此相反，他在“序言”的第二部分——它几乎占据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中远为详细地探讨了这部计划中的著作的哲学方面，尤其探讨了关于黑格尔的“最后一章”。在他颇有意思地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找到机会沿着这一方向大步前进之后，在第二部分中，反对鲍威尔的论战成了主导性动机。

作为马克思计划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首个明确说明，“序言”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现在所计划的整部著作首先是针对鲍威尔的。这里再次清楚地表明，对马克思而言这一方面的核心问题是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另外，对马克思来说，这一批判在当时是不能同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成果相割裂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后者的成果之一。尽管如此，先批判鲍威尔以便之后再写作一部特别的“国民经济学著作”的决定，可能是在恩格斯来巴黎拜访期间作出的。<sup>②</sup>

## 七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马克思进行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可能是在1843年底开始、在1844年5月又重新着手的“对国民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奇怪的是，依据迈尔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第154页）中的观点，许多著作家认为这句话尤为贴切地反映了这部“著作”的积极内容。参见朗兹胡特与迈尔：《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1卷）。

<sup>②</sup> 从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很清楚，对马克思而言这二者很难割裂开来。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20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

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的过程中，自1844年初开始做的那些笔记的复杂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已经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概括其计划——它本身是在那一研究过程中才诞生的——的那部著作，甚至连那部著作的草稿都不是。全部笔记——逐字的摘录、简洁概括的意译、批判的评注、独立的反思、新的摘录、新的反思——记录的不是一个特定的认识阶段，而是一个持续数月的、主要但不仅仅是通过那一“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而得到滋养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打算在发表文章时利用他的国民经济学的可能的成果，这几乎自不待言。尽管这些研究在第一阶段可能只是计划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准备材料的一部分，但是在马克思重拾这项研究之后，它日益获得独立的重要性。这尤其表现在，马克思把他所获得的见解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自由的文本，而就这一文本来说，他从一开始就用指向上述目的的形式来撰写它。于是，从A7的前几页起他就频繁地使用表示谦虚的复数。应该强调的是，甚至当他在笔记本中相当简洁地评述所做的摘录时亦是如此。但是，说从一开始马克思的头脑中就有写作一部诸如“国民经济学著作”的计划，这是令人怀疑的。毋宁说，起初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从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出发，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认识，由此又导致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循着从阅读的书籍中获得的启发继续阅读。于是，他愈发自由地书写他所获得的思想。就我们对他当时各种计划的认识而言，它们似乎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才形成的，但并不以此为唯一的基础。另外，这些计划——在实施这些计划时，马克思无疑想使用他所收集的国民经济学材料——远远超出了这些材料；与之相应，这同样——这些计划形成得越清晰，超出得越多——适用于马克思所记录下来的那些思想。当马克思写作A9时，“序言”中勾勒的计划才在这种形式下成形。

“序言”不仅是对马克思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一计划的第一个明确说明，而且同时表明，它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要加工整理”一些东西。尽管马克思在A9中直至第XXXVIII页都没有“加工整理”任何东西，而是流畅地、松散地、几乎不作任何删节地直接写下脑海中涌现的想法，但是他在“序言”中却只写下了对鲍威尔的讽刺之语，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在其中删掉了如此多的内容，以至于在某些地方连文本都模糊难辨了。<sup>①</sup> 这似乎让人预感到，这项加工整理工作还会花费马克思大量功夫。当他在将近四十年之后去世时，这一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① 参见MEGA<sup>1</sup>第I部分第3卷第590页的复制件。

前面给出的对《手稿》的描述对它本身内容的说明还不多。它不会妨碍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把这部“手稿”优先于马克思后来写的所有著作。但是，这种类型的笔记是否可以——即使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马克思“最核心的著作”看来是成问题的，因为似乎晚年马克思事后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当马克思——众所周知，他本人没有发表这些笔记——在两年后给出版商列斯凯写信说，“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拿去付印”<sup>①</sup>，就绝不仅仅是个托辞了。

正是因为马克思写得如此顺畅，所以他在1844年所做的笔记极富启发性。但是，是否已然可以得出，马克思在其中所触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来并不是毫无关联地、杂乱无章地经过他的头脑的，他打算构建一个“体系”，这似乎并不确定。去考察马克思当时阐述的哪些思想涌入了他后来的著作，或许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一考察将会聚焦于对他后来所写的著作的分析。反过来说，考虑去阐明他在1844年所作的笔记中只是频繁提到的、后来才详细阐述的内容也是合法的，但是他在1844年所写东西的意义将主要从他当时的写作背景来确定。通过某一书籍而归纳的思想，如果脱离这一书籍就几乎不能被充分地理解。任意地割裂《手稿》的各个部分，甚至把所谓的“手稿”和其他的“笔记本”完全分隔开来，将使人误入歧途。

相关的所有笔记首先开启了对马克思在转向直至当时尚不了解的国民经济学领域的那几个月中思想发展过程的认识。我们可以想象，他开始他的国民经济学研究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当有人——例如罗·塔克尔（R. Tucker）——为此指责马克思时，这证明了一种并非新实证主义的，而是考古实证主义的幼稚。<sup>②</sup> 毋宁说，重要的首先是获得新材料的方法，然后是利用新材料的方法。波比茨所假定的需要相应意识的、事后在经验中“掩盖”思辨前提的“尝试”<sup>③</sup> 几乎不能被证明。需要验证的是科尔纽所持的观点：因为“要创立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所以马克思“尤其”使用他读过的书籍来“支持他所获得的观点”<sup>④</sup>。如果事实如此，那么马克思的行径将是任何从事“认真的批判研究”的人所不应做的事情的绝佳范例：从文献中挑选出与他事先想好的观点相符

① 《马克思致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当马克思写道“不……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时，这可能是个托辞；前面的说明，即“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可能是有意的夸大。

② 参见罗·塔克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剑桥：1961年，第171页：“科学理论通常在它们的作者沉浸到理论试图解释的经验材料中之后才诞生。但是按照其创立者的说法，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却并非如此。这门科学是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改造性的批判而形成的。”

③ 波比茨：《异化的人》，第117页。

④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第126页。

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如此轻率地这样做了；这也不意味着，自 1844 年初“加工整理他的世界观”以来，马克思总是事先就已经知道他会在阅读的大量书籍中发现什么，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什么都不必学。

萨伊在谈到斯密时远为贴切地道出了这里所意味的内容：“一位天才受惠于他周围的一切，他所综合的零星观点，他所推翻的谬误，甚至是攻击他的敌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的看法的形成。然而，当他一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对同代人和后代人都有益的宏大见解时，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受益于他”<sup>①</sup>。

附录

笔记本 A7 (= “第一手稿”) 的图示

第 9 纸面	左页	第 X 页	A	Bb	C	第 IX 页	A	Bb	C	右页	第 10 纸面
	右页	第 XI 页	A	Bb	C	第 VIII 页	A	Bb	C	左页	
第 8 纸面	左页	第 XII 页	A	Bc	C	第 VII 页	A	Bb	C	右页	第 11 纸面
	右页	第 XIII 页	A	Bc	第 VI 页	A	Bb	C	左页		
第 7 纸面	左页	第 XIV 页	A	Bd	第 V 页	A	Bb	C	右页		第 12 纸面
	右页	第 XV 页	A	C	第 IV 页	A	Bc	C	左页		
第 6 纸面	左页	第 XVI 页	C	Bc	第 III 页	A	Bb	C	右页		第 13 纸面
	右页	第 I 页	A	Ba	C	第 II 页	A	Ba	C	左页	
第 5 纸面	左页	第 XVII 页	A	C	Bc	第 XVIII 页	A	C	Bc	右页	第 14 纸面
	右页					第 XIX 页	A	C	Bc	左页	
第 4 纸面	左页					第 XX 页	A	C	Bc	右页	第 15 纸面
	右页					第 XXI 页	A	C	Bc	左页	
第 3 纸面	左页					第 XXII 页	A	Ba	C	右页	第 16 纸面
	右页					第 XXIII 页	A	Bc	C	左页	
第 2 纸面	左页					第 XXIV 页	A	Bc	C	右页	第 17 纸面
	右页	[书目]				第 XXV 页	A	Bc	C	左页	

①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 1 卷），巴黎：1817 年，第 XLVII 页。



续前表

第 1 纸面	左页				第 XXVI 页	A	C	Bb	右页	第 18 纸面
	右页	笔记本 I			第 XXVII 页	A	Bc	C	左页	

A=Arbeitslohn (工资)

Bc=Gewinn des Capitals (资本的盈利)

Ba=Profit des Capitals (资本的利润)

Bd=Gewinn der Capitalien (诸资本的盈利)

Bb=Capitalgewinn (资本盈利)

C=Grundrente (地租)

笔记本 A9 (= “第三手稿”) 及 A9\* (= “第四手稿”) 的图示

第 16 纸面	左页	第 XXXIV 页			第 XXXV 页	右页	第 17 纸面
	右页	第 XXXIII 页			第 XXXVI 页	左页	
第 15 纸面	左页	第 XXXII 页			第 XXXVIII 页	右页	第 18 纸面
	右页	第 XXXI 页			第 XXXVIII 页	左页	
第 14 纸面	左页	第 XXX 页			第 XXXX 页	右页	第 19 纸面
	右页	第 XXIX 页			第 XL 页	左页	
第 13 纸面	左页	第 XXVIII 页			第 XLI 页	右页	第 20 纸面
	右页	第 XXVII 页			第 XLII 页	左页	
第 12 纸面	左页	第 XXVI 页(!)			第 XLIII 页	右页	第 21 纸面
	右页	第 XXIV 页				左页	
第 11 纸面	左页	第 XXXIII 页(!)				右页	第 22 纸面
	右页	第 XXI 页				左页	
第 10 纸面	左页	第 XX 页				右页	第 23 纸面
	右页	第 XIX 页				左页	
第 9 纸面	左页	第 XVIII 页				右页	第 24 纸面
	右页	第 XVII 页				左页	
第 8 纸面	左页	第 XVI 页				右页	第 25 纸面
	右页	第 XV 页				左页	
第 7 纸面	左页	第 XIV 页				右页	第 26 纸面
	右页	第 XIII 页				左页	
第 6 纸面	左页	第 XII 页				右页	第 27 纸面
	右页	第 XI 页				左页	

续前表

第 5 纸面	左页	第Ⅹ页				右页	第 28 纸面
	右页	第Ⅸ页				左页	
第 4 纸面	左页	第Ⅷ页				右页	第 29 纸面
	右页	第Ⅶ页				左页	
第 3 纸面	左页	第Ⅵ页				右页	第 30 纸面
	右页	第Ⅴ页				左页	
第 2 纸面	左页	第Ⅳ页				右页	第 31 纸面
	右页	第Ⅲ页				左页	
第 1 纸面	左页	第Ⅱ页				右页	第 32 纸面
	右页	第Ⅰ页				左页	

## Marxism-Marx-History ——The Case of So-called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Jürgen Rojahn*

**Abstract:**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relevant excerpt notebook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original archive preser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 provides quit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hilological status of the 1844 Manuscripts and excerpt notebooks, and makes very serious and critical research o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ose manuscripts and notebooks. The conclusion is, “Second Manuscript” is very likely the end of Comments on James Mill; 1844 Manuscripts may be not the work that Marx has mentioned in the “Preface”; 1844 Manuscripts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xcerpt notebooks.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xcerpt notebooks, material critique

**Author(s):** Jürgen Rojahn,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 Editor of MEGA<sup>2</sup>.

**Translator(s):** Zhao Yul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